

學 文 告 報

著 諾 史

譯 振 國

亞洲之戰



世界名著叢刊

亞 洲 之 戰

美·史·諾·著
國·振·譯

目次

譯者序.....四

第一章 再會吧北平.....五

(1) 逃亡者

(2) 君子和小人

(3) 七七

(4) 燕北前線

第二章 淞滬戰爭的重演.....二六

(1) 侵略者

第三章

日本的反共……

(2) 國防

(3) 戰事的回憶

(4) 戰艦的威力

(1) 殺人的教育

(2) 怎樣可以親善

(3) 孤島上海

(4) 上海的巡禮

五

譯者序

本書原名 *The Battle of Asia*，係前燕京大學教授愛德遜史諾所著。史氏是美國名記者，曾數度遊歷中國各省。本書描寫這次中華民國神聖抗戰的史略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幕。它像一本歷史，可是並沒有教科書式的枯燥；也許可以說像一本小說，可是並沒有半點虛構；也許有人會說像一篇遊記，可是沒有分毫無聊的成份。這裏有的並不是歌頌和褒揚，也不是傳奇和幻想，更不是閒情和觀賞，而是悲壯的史實，不，是高速度的快鏡。這裏有我們 蔣委員長率領全國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的宣言，實幹，硬幹和苦幹！ 蔣委員長會對史氏說：『請把地圖打開來看，日本和中國比起來是何等渺小，對於我們最後勝利請問有誰會發生疑問？』現在，最後勝利終于是我們的了！

這裏也有日軍在華暴行的真相。我們最近從報上看到日本馬來之虎山下奉文的罪惡，他指揮下屬的殘虐之道，使人聽了不寒而慄，可是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未嘗不是這樣，也許有過之無不及，這裏像一篇流水賬，寫出來歷歷如在目前。同時，這裏也有特寫的鏡頭，像前線將士正冒着炮火，凍得半死，在戰場上和敵人死拚；而後方的人士，尤其是在上海，卻正擁着女人，醉生夢死，在舞池裏和對方狂跳。這一切鏡頭都攝進了本書。

本書譯文祇及全書的三分之一，因為後面的三分之二，礙於內容不便發表，是故特向作者讀者致歉！

譯者寫于卅四年聖誕節

第一章 再會吧北平

(1) 逃亡者

我們要征服世界
必須先征服中國
——田中奏摺

日軍佔領北平之後，城裏起了大騷動，大家都瘋狂地爭先恐後地逃。可是太晚了，這古老的牆垣城牆以前是虛有着安全之名，現在却成了樊籠了。這最後的命運終於降臨了。人們似乎是牢獄裏的罪犯一般地等待着判決的一天。

侵略者提出一張通牒，幾個愛國份子，激烈份子和各派的熱心份子的名單交給新改組的偽警當局，這些偽組織便出動了大隊人馬幹了些無謂的騷動。大約有二星期左右到天津去的火車停止通車。在那崇高的城門的兩旁，日軍嚴密地戒備着。逃亡者白天裏忙到東到西地躲避，晚上便計劃怎樣可以逃出這座在他們心目中稱的死城。報紙都停了版，人們全依着謠言度日子。

有一位著名的大學教授聽到了英國領事在領事館內曾勸誘宋哲元將軍把這座城和平地交給日方，若有其事的傳說；他認真地找到我家裏來，要請我到領事館去一趟。懇求領事來「負責保證抗日份子的安全。」有一個以前我在燕京大學的門生，聽到了美國海軍將根據「九國公約」出來維持北平的治安的傳說，便急急地喘着氣趕來問我這消息是否是事實。另一個學生從北大逃來怒氣未息，因為他無法逃出城去加入游擊隊伍。他問我英美當局能否利用他們的軍用卡車把抗日學生護送到郊外山上去。有許多教授們都抱着樂觀主義，他們深信英美立刻將和日本決裂，因為日本已經觸犯了國際間的協定。可是當我建議地回稱英美二國政府一時不致於會給中國什麼有力的援助。

可是我至少盡過一點力量來保護我的朋友們；因為我在這城裏安適地住了四年，他們都很敬重我。那時我和一個瑞典商人共同居住了一個很寬敞的地盤。就因為寬敞的緣故，裏面有許多房間空

清。事變後便立刻藏滿了有關政治的逃亡者。那位東北大學的校長便選定在就近大門口一個房間裏躲着。有一個僞警每天來到那大門口報告最近日軍活動的新聞給他聽。還有五六位住在近牆角的地方，預備候機逃越。那時我每天防着日軍會光臨搜索的。

在日軍進城之前，北平城裏大有人滿之患。居住發生問題；可是現在有許多人預備把房屋租給我，房租便宜得近乎笑話，有的簡直連房租也不要送給我自住。日軍竭力囊括那最好的建築物，唯有西人的住所才可以免災。在這城裏，無論是誰，都願意把他的收音機送掉，因為在日軍的心目中認為有無線電的人是共產黨。可是最使人感動的便是那些學生們，他們不忍把心愛的書本消毀，到我這兒來要求把書本埋在我的天井的石板下，直至「北平克復」時再掘起來。

過了一星期，有幾個學生不來了，其中一二個是被日軍捕獲；可是大多數溜到城牆邊，在那兒巡狩的僞警也轉過背來裝着不聞不見地讓他們悄悄地爬出城去。就在這種方式之下，一小隊一小隊的學生們越過了行宮到西山上去組織游擊隊。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裏，日空軍轟炸這些小山頭把他們的隊伍炸散。

一天下午，下着陣頭雨，有一個姓吳的中國青年奔進了我的門口，在他的光頭上揮下了雨水和汗水，滿面笑容地把我的老朋友張裕成——以前是一個東北的長官，現在領導了一隊游擊隊在城外活動——的一張名片來見我，他告訴我在幾天前他們如何「佔領」了在那城西的軍獄。他們把看守的僞軍交械，並且獲取了裏面的鎗械軍火，而且把這獄裏的人犯（大多是政治犯）幾乎全都徵入了他們的隊伍。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襲擊，在日軍聞訊趕到之前，他們——連那守衛的僞軍也在內——都已逃之夭夭了。

可是姓吳的似乎還有什麼事要啓口。他說，他的隊伍——他們後來歸編到趙侗（他是一個著名的游擊領袖，後來在一九四〇年被鎗殺在北平近郊）部下——曾襲擊了妙峯山附近的西園陵，僅僅在幾

小時之前，日軍也到過那兒。他們的隊伍便在那裏發掘了不少的珍寶珠寶金玉等貴重物品，預備發賣了給新編入的隊伍做軍餉和配備之用。吳就問我美國政府可要不要購買這些珍寶，當我嚴肅地表示遲疑時，他感到極度的失望。後來又要求我替他設法。

「收留抗日團體」是日方新聞發言人針對着我們而發的表示。其他西僑都感到無法拒絕收留那些政治犯，這是一件事；可是幫助他們去銷售這爲抗日而劫得的珍品（雖則也許可以稱之爲合法的戰利品）卻是另一件事，不可以同日而語的。我深恐我們的領事館會感到麻煩而起釁干涉，當我的報紙——雖則對於這種事件可以格外自由地刊發——也許會過份一點似乎是另有其人在幕後指使着一般。但是有一件可以排解的事發生在我面前，我可又不得不干涉一下。在二三天以前，有一隊游擊隊把幾個義大利的修道士和牧師從一個教堂裏綁了去關在西山上，後來便向北平城裏的日軍當局提出勒索的條件，他們的目的是不但要使西人目光中看出日本人對於這事的窘狀；同時他們實在需要一筆現款來購買糧餉，因爲他們正鬧着飢荒。我便疑及吳君也許會知道這件事的，果然後來證實我料得不錯。吳君承認他的同伴們是把那些肉票藏在妙峯山附近。

「這不是一個好辦法，根本不能博得外國的同情心，」我說，「假使你們不願意人家把你們當做土匪看的話，你們最好立刻把這些牧師們放出來才是。」

「可是這羣牧師們是親日的，他們一半爲日軍所利用，」吳君辯護着，「這次劫綁因爲他們設宴款待日本軍官，他們把我們的祕密報告，日方最近把我們幾個用作游擊根據地的村莊燒燬，意大利又承認了偽滿洲國，並且簽訂了反共協定，你想他們是不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嗎？」

雖然我是受過洗禮，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天主教教徒，我僑居在中國也已經有相當長久，所以對於中國人的觀念也很明瞭。我便化了足足有一小時光景的口舌，開明地解釋給吳君聽。我忠告他們最好把一切的正義用宣傳的方法向世界各國徵得同情和援助是比較任何要挾方式高明得多，而且可以得益

非淺。最後他似乎贊同了我的意見。我便對他說，假如他們肯釋放那幾個俘虜的話我願意設法替他們把那些珍寶全部銷售去，得到了這樣諒解之後，他便向我告辭。

我還是有點懷疑着他是否會依着我的忠告去做。但是事實立刻證明那幾位牧師不久便被釋放出來，個個都很健全地回來。據我所知道清軍游擊隊從此再也沒有這種事件發生了。

過了幾天，當我正在想吳君會回來的當兒，突然來了一個電話，是一位教授的太太請我去晚宴，我便應邀前去。在席上互相談了約半小時左右。又來了一位中國女子，戴了一副黑眼鏡，頭髮很長，我看起來有些面熟，但是我想不起究竟是誰。直至她除去了黑眼鏡笑着向我招呼：「你可不認識我了嗎？」才無疑地她是我在北平所會見的最後的一個女子，也就是日軍首先要通緝的一個人。她叫鄧穎超，是中國共產黨女子勞工部領袖，就是前中國蘇維埃政體副主席周恩來氏的夫人。

「我以爲你在陝西！」

穎超說，她是在五個月以前祕密地來到西山來養病的。她的確比一年前我見她時面色慘白，形容瘦削的情形（她的肺病是在長征期內發生的。）是好得多了。她住在西山的一個孤零冷僻的菴堂裏，吃的是新鮮的食品，安閒地度着北方的春天。這樣果然治愈了她的病。她一些兒也不知道這次戰事的爆發，直至日軍迫近了她的菴堂才發覺。她險些兒送了命。她化裝了農婦越過了日軍的防線來到北平。

「可是你一定不預備在這裏就攔下來？我想。」我懇問着。

「我不就攔！我預備立刻到西北去，」她說，「你可能伴我坐火車到天津去嗎？」

向天津去的火車還祇剛才恢復通車，每天祇一班慢車大約需十二小時之久，比以前慢一倍。日軍很詳細地搜索每一個乘客，尤其是在天津站，如果有誰臉色上似乎有政治犯嫌疑的話，立刻會被日軍抓出來。許多學生遭殃被扣留後毫無音訊。所以這次旅程中帶了穎超這樣的人物在一起確是相當的危

險。但是日軍還沒有扣留外僑的企圖，（雖然這時天津已有嘲弄外僑的事件發生），我便告訴她，我預備伴她到天津去，並且建議她可以裝扮我的女傭安全地混過去。

事情可真湊巧。因為這時的電報局是在日軍手中，誰也不能得到一點可靠的消息，除非經過了日軍檢查之後，所以北平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死城。我接到了一個耽擱了多天的電報，是每日新聞社拍來的命我到上海去。這時上海正展開着大戰，同時也正要西北去找我分手的妻子，娜姆到延安去要參觀所謂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情形，以廣眼界。我決定要去嘗試那千里遙遙的紆徊曲折的旅程去看她。

可是還有一件事沒有了結，便是那掘陵盜寶的吳君的事，隔三天他來看我時，我便告訴他我將離開這兒了就囑他從迅進行這事才是。他便答應在三天之內把那珍寶的目錄和樣品送來，我便可以把這些東西給一個可靠的美國商人看。我預料這個美國商人會冒着絕大的危險來出資購買這些珍寶，但是正巧一隊日軍在妙峯山附近襲擊了吳君的同伴們，於是便把吳君的約期攔下來。一連過了五天，我可等不住了，我便把這件遞清遺傳珍品的生意經交給一個同鄉老友去辦理，我想信他能吧這件事結束得非常圓滿。

穎超來到大前門車站，她變成了一個十足阿媽型的女傭。我看見她很安全地在一個車廂裏面，在那兒便被爭先恐後的一羣擠得不見，望過去祇見人頭，可是他們似乎不怕擁擠，就因為每天祇有一班火車逃出這座死城。因為北平的歷史上這樣還是第一次，人們恐懼着今天過了不知明天怎樣。我在最後的一節車廂的踏脚板上佔着了一點立錐之地，最後我找到了一個制動機的把手便當作臨時座位。就這樣我的頭和脚伸出在車廂外邊曬在強烈的日光裏渡過了不久洪水泛濫的田地往天津去，我便向這古老的城牆毫無留戀地說一聲「再會吧，北平！」

以前在外僑心目中所戀戀不忘的北平，現在是過去了，因為我這時在車上閱着無事於是腦海裏便趁着這空閒的當兒反映出這古城的以往的一切輪廓，後面便是我所能憶記的片斷的寫照。

(2) 君子和小人

北平必將有事變降臨了。

這是一座非常榮耀的古城，計算起來大約是從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在這座偉大的城牆裏住着一百多萬的居民。北平是充滿着下野的官僚，退伍軍人，學者，大地主，僧道，藝術家，商人，以及出口斯文的人力車夫真是高貴地蘊藏着藝術的寶庫。它是一個貴族興亡之所，也是外交上陰謀分盟集合的地點，它比花且更嫵媚，可是也比流氓更下流的淵藪。它是一個具着朝氣蓬勃的春天的城池，可

福悲欲見孔子
子辭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于——論語
陽貨第十一章

也是一座籠罩着陰暗的秋意的古城。在冬天那陽光射在覆滿了白雪的枝頭和冰凍的湖池上這古城又是另有一番氣象。它也充滿着笑聲和永遠的協調，閒情和思鄉的情緒，貧窮和悲劇的泉源等平凡的事物；可是同時也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學生們喊出一片為國家而抗戰的呼聲和示威的城市。有時從那蒙古大戈壁飛來了彌天黃沙把那富麗堂皇的廟宇和雍容華貴的宮殿的屋瓦上播滿了金黃色的塵沙。

自從一九三四年日軍佔領了熱河省之後，北平又是國防的最前線了。我們在這裏住了好久對於這座沒有保障的城市的命運遷延了這麼久不得不表示驚奇起來。一連經過了不少次數的危機，結果這城壁依舊在中國軍隊手掌之中。也許這是事實，那些日本人也愛護這個古城，並且願意把這座極有價值的古城保持完整。但是事實是這樣的他們所遭到的反抗比他們的挑釁更激烈，所以最後當這座古城失陷時卻產生了一頁光榮的歷史。

最後防衛這所美麗的古城的是一位很和善而並非傀儡性的老將軍宋哲元。他是一個軍人而且是個愛國份子。而他的政治頭腦很合宜于這古城的封建思想。他對於日方不失恭維的態度，同時他有他的詭計總比日方棋高一着。他並不是一個前進的統治者（在這種環境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忍受得住的）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賣國賊。他有他的見解，雖則他祇是一個軍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訓練，可是對於這個

最困難的外交折衝的地位，宋將軍卻能運用他的手腕克制了這政治上陰暗的鬥爭。日方軍閥陰謀家在二年前把他捧上了台滿以為可以把他指揮如意，可萬想不到竟然毫無進展反而有倒退之勢。

回想起來大概從一九三三年起宋將軍已博得民心和實權。當日本佔領熱河後向北平進展時他的二十九軍在長城的喜峯口和日軍肉搏殲滅了一支團日軍，於是他的英名便滿佈全國，可是終于在寡不敵衆之下他也無能爲力。中央沒有遣兵援助結果由南京政府在華北簽訂了一張塘沽協定結束了這件戰事。可是這僅僅是暫時性的苟延，不久日本便要求把駐河北省的中央軍撤退並且撤銷 蔣介石軍事委員會支部。

爲了諒解起見 蔣總裁便同意了成立所謂冀察政治委員會，由宋哲元任主席。宋係前馮玉祥老國軍軍部。馮曾和 蔣總裁開戰過好幾次，以前是向來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就爲了這點宋哲元便被日方關東軍特務隊首腦土肥原所歡迎。日方以爲宋將軍能把這區治到使日方滿意地步，他們滿以爲宋的政治慾望正會中他們的意旨，所以「擁立」他做這新成立的冀察政治委員會主席。在他們心目中認爲這是「半自治性的機構」。

事實上日本是把宋哲元估錯了。宋並沒有叛國的企圖，可是他很聰明地敷衍。日方老是夢想他最後終于會向南京宣告獨立，而做日方支持下的華北五省自治政府的領袖。如果宋哲元完全依着他們的計劃幹，那末日本可不必發動這次大戰而立刻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宋上任不久土肥原便想試探實行他的大陰謀，他私自向宋提出意見把「華北」宣稱爲「自治政體」，土肥原預備立刻拿出一萬萬元來支持宋哲元並且重行配備和訓練宋的軍隊。這樣的誘惑力着實不小，因爲宋並不富有而且南京方面也不怎樣信任他。假使他這次拒絕了日軍勢必進攻，那末他根本也沒有得到什麼保證的後盾，或則結果決沒有像以往一切情形般簡單地把他軍隊解散便可以了事的。

經了幾天的考慮之後，宋似乎有接受的可能，同時土肥原要強化他的『貢獻』又在冀東發現了許多『土匪』（當然是日方所僱來的）。這冀東區是據在天津和長城之間的，由塘沽協定規定中日雙方不能駐軍的。土肥原便不顧了塘沽協定便擅自進兵冀東來『恢復秩序』。同時使宋哲元知道，假使宋不接受他的意旨的話，他在山海關帶有幾師團的軍隊候命待動。

南京中央的訓令始終含糊，對於宋的立場沒有明白和確實的保障和援助，可是有兩件事發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便是土肥原私自致宋的最後通牒到期的前夜）在北平城裏料想不到地發現了大隊學生游行示威運動反對設立任何『華北自治運動』，『接着日本的電訊社到處都發現了這樣的示威運動。雖然當時北平警衛當局（由尙留在城內的 蔣委員長第三隊統率之下）壓制了這示威運動。宋哲元認清了這件事的嚴重性便通知土肥原把這件事暫且緩擱起來直至羣衆的情緒平靜後再作道理。

另一件事便是這位見貌辨色的老宋自己突然生起『貴恙』來了。在這個時期內宋駐津的隊伍眼看到了駐華北的日軍行動和土肥原的計劃非但完全不一致而且近乎反對的模樣，南京看到了這種情勢便鼓起了勇氣向東京提出質問，那時日本確是預備不費一兵一卒隨手獲取華北，可是根本還沒有準備開戰。因了華北的抗日氣氛濃厚，警惕了日本政府深恐抗日的情緒會遍及全國，便拒絕了土肥原的大計，于是他的華北自治運動宣告流產。不久之後土肥原本人告訴我無論如何這件事完全是報紙上的捕風捉影的空話！

但是爲了顧全面子起見，土肥原仗了東北關東軍的支援之下便在那『無武裝區的冀東』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叫做『冀東反共自治政府』。共計二十三縣歸半日本化的傀儡殷逆汝耕治理，這塊肥土除了戰略上爲日本所必需之外，同時也是一個絕大的麻醉和走私的大本營。在這裏日本傾銷了價值千百萬的逃稅私貨和鴉片海洛英等毒品。專營這種走私販毒的日韓浪人們在日軍特務隊庇護和指導之下向南推進。

北平在軍路上的險要一天天減低下去，因為日方的一切行動無論在軍事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會使北平向畸形方式中進展着，除了樹立了冀東偽組織外日方幾乎控制了北甯路（自山海關至濟南）「禁城」全線。他們在這條路的各據點上分佈了七千多人的軍隊，而且在華北最大的商港，天津和北平的使館區駐紮了軍隊，營房築得非常考究，大有久據的模樣。本來這種守備隊是根據一九〇一年的拳匪之亂所訂的和約內稱列強可以在北平到天津沿海區內駐紮少數的防衛軍隊，可是日本的駐軍現在竟超過了各國的駐軍幾倍，並且都利用來幹不法行爲，他們可以任意在郊外繼續不斷地來去示威「演習」，並且恫嚇和襲擊中國海關駐關人員和中國鐵路人員，當他們扣留走私或查問身上的大批包裹物件的車票的時候。

宋將軍確是無力去阻止這許多荒唐行動，而且對於他的隊伍時常受辱的事件唯有忍受，他自己手下祇有二十九路軍共計六萬人，其中祇有一萬人可以留在冀北。他對於南京的支援是極渺茫，因為中央自委員長以下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有信心。那兒無論發生什麼事故宋總是首當其衝，代人受過。他自己也明白他是一個時間緩衝人物，他始終維持着他自己的宗旨，就因為日方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始終夢想他會就範的，這樣一直拖到日本感到不得不向中國開戰時才會開始向他襲擊。

這簡直是空前絕後的又奇特又微妙的政治作用，宋將軍在左面應付右面敷衍方式之下維持着。一忽兒向中央効忠，一忽兒向日方招呼。當日方要求把委員長的特別警衛隊遷移並且消滅藍衫黨時，宋便允諾下來，人民於是懷疑他是祕密地得了賄。當日方要求他聘請日本顧問，他也照辦，並且，很嚴肅地接受他們的忠告，可是從來也沒有依着這些忠告實行。當南京方面的輿論高喊着道德淪亡和重振道德的時候，他便在數星期內鎗決了一百多名的黑籍同胞，行動比委員長更激昂，他擁護新生活運動——這孔夫子的金科玉律打動了宋的封建頭腦。

在表面上宋是極端地制止激烈份子，可是據我所知道的有十多位激烈的政治犯在北平。宋的下屬

秘密地鼓勵着某種抗日組織和出版物。我看見過他的軍隊在北平城頭上讀抗日的文字。還有那張宋哲元所資助的北平新聞表同情于抗日的行動。尤奇特的是全國學生抗日組織中最強盛的卻在北平。最後他們都起來支持宋將軍。那時當地的反日情緒，由指摘宋的輿論轉而批評南京的不抵抗政策，而日方對於南北異見表示歡迎；同時又感到抗日輿論對於他們的威脅，這種畸形的局勢大約維持了幾個月之久。

宋將軍善於打撲克，同時也是一位鬪劍專家，他有時會來邀請我們去和他打彈子。他是身材相當魁梧的山東老鄉，他的面部和菩薩一般肥胖，老是吸着一枝粗粗雪茄煙。他充滿了孔老夫子的氣息，這樣可以用來掩飾一切。他的左右也有許多愛國熱心的青年，當這輩青年對於他這種敷衍忍無可忍而要求他『組織人民軍』的時候，他會用一套忠孝的大道來勸告他們，或則勸他們參加和嘗試軍隊生活的苦楚，或則索性勸他們去和女校書混在一起。他以為未婚男子大多會採取激烈主義而這種騷動的情形的重要性也正爲了這輩青年人不願早婚而成的。

當他自己首當其衝的難題來臨時，他可從來也沒有失算他老人家的政躬會驟然遠和起來。如果在極嚴厲的壓力之下他會回老家去『掃一下墓』，而且不是平常的短時期的『掃墓』，這事實表演使日本明白他們休想隨手獲取，他們要華北達到目的不得不發動蘆溝橋事變。

前國民黨英雄汪逆精衛曾批評宋是一個老奸狡猾的『反動份子』，他會激使日方運送百萬大軍而且化上二千萬萬日圓的龐大的代價來換取寸土，而事實方面卻很輕易而可隨手獲取的。

(3) 七七

中國人計算時日另有一種特殊的辦法，便把月份和日期一樣依數目簡稱。比如什麼『國恥日』『事變日』他們會喊『五、四』『九、一八』他們的國慶叫『雙十』。可是你聽了也許會誤會着玩足球的計分。這次可在他們的紀念日期單

寧爲玉碎不願瓦
全——中國格言

上又添上一個「七七」，便是蘆溝橋事件。下面便是我對於「七七」這事件的一些敘述。

宋將軍這次「掃墓」正和英國張伯倫的下鄉「垂釣」一樣，當他們對於此時此地的高潮發生的時候才這樣。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宋溜到他山東故鄉去避免日方無理要求一切新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方面的讓步。有一點是日方所堅定的，當日軍在北平到蘆溝橋的地段視察之後便向宋要求把百畝左右的良田讓給日軍築飛機場和兵房。這似乎是芳鄰的合理善意要求，所以宋這次驟然的「孝思」並非事出無因的。

蘆溝橋是平漢路上的一個車站，在永定河的東岸，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同時也和平津路啣接。在一年前（一九三六年五月）日軍擅自地佔領豐台在這線的東端，所以佔領了蘆溝橋之後可以控制由南北上的各線。在蘆溝橋車站之東幾百碼之地便是宛平古城。那兒我曾偕同幾個友人去瞻賞那座具有歷史性的石橋，下邊開了三十個宏壯的拱門，這便是麥高包祿所宣揚的名勝。

日方特務隊和中國地方當局開了不少次的會議，商討那蘆溝橋和宛平城間的地盤。但是宋將軍總想保持這最後的一道防線，同時他也無法阻止日軍在鄰近的一再演習示威，這所謂「演習」一次次的增多，總于在七月七日晚上藉口一個日兵失蹤而驟然要求進宛平城搜索——他們說這是爲了「和平」而要求！

可是那縣長卻不願意接受這種「和平」，便正義地拒絕日方，於是整個北平城在當晚半夜裏被傳來的鎗砲聲驚醒了。日軍用迫擊砲攻宛平城了，同時駐在城內的少數中國軍隊也開火還擊。到了明天早晨當我坐了汽車駛過永定河，我看見日軍已經佔領了蘆溝橋車站，同時向着宛平城裏和蘆溝橋上的中國軍隊互相開火。這相持了幾天之久，二軍相距僅幾碼路。我在那前線來往並無阻礙。依當時的情形看來這是一件極容易解決的事件，如果日軍肯撤退到他們原駐的防地的話。

對於那位失蹤的日兵，日方便不再提出引證來。當我們新聞社方面要求敘述這事的經過時，他們竟拒絕討論這失蹤的事。他們把國家大事放在前題作檢討，便把這小卒的事抹去了不提。這件事的起

初究竟是不是特務隊擅自行動的呢，或是東京方面最高當局所指令的呢？我可不得而知。可是依事實的發展趨勢看來，東京方面確是預備把這件事擴大起來。你可以看到過去的許多事件，雖則國際調查報告稱日本是不應當這樣侵略人家，可是結果總是給他們的後代拓展了不少的地盤。

那關東軍立刻迅速地向冀東和天津增援，在七月中旬已超出三萬多名。當時在華北，南京和東京以及全世界各國的京城都竭力呼籲着和平解決，可是日方根本不願訂立什麼和約，他們的心目中祇是獲取華北除了華北之外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事實是很明顯地看出日本的一切協商折衝會議完全是外交上的煙幕用來掩飾他們的軍事準備和進展。

可是當時的情形，戰爭或是和平，軟化或掙扎，全要看南京方面的政策來決定。中國政府在牯嶺召開緊急會議，委員長從各方面的輿論看來，感到必須要一個強有力的決斷，即使他的最幹練最親信的將領也認為再度讓步必將釀成內部的不安；同時他最有力的反對派也來電聲稱將以全力支持他擁護他如果他決定抗戰的話——並且警惕他倘如再行軟化的話，中國的前途定將不堪設想了。在七月十七日的那天委員長再也不能忍容了，發表了他的明白透徹的宣言，於是這具有歷史性的戰爭的展開是決定了。

蔣委員長宣稱「任何國家無論她是怎樣柔弱，最底限度必須維持四點立場方才可以開談判之門，而且這四點必須承認是：（一）談判必須不侵蝕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獨立。（二）冀察政治委員會的政體必須由中央政府支配不得有任何更改。（三）華北官長（連宋哲元將軍在內）不得由日方調遷。（四）第廿九路軍不得再作寸土的讓步。」

「讓我們的人民認清」，蔣委員長說，「犧牲讓步是有限度的，現在我們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們必須起來抗戰，抗戰到底。如果我們再作猶豫或夢想苟安的話，那末我們必遭永遠的滅亡！我們唯有把我們全國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拿出來爭取最後勝利！」

可是在這樣宣言之後，中國在和平尚有一線希望之下仍願容忍，例如在北平至天津之間的一個小鎮廊房，那兒僅有少數的廿九軍駐守。有一天晚上，幾個日本軍官和日兵向中國駐軍方面要求使用軍用電話，中國軍隊便請他們把武器留在外邊，可是日方竟不顧一切衝進營房來把電話接線處佔據了。當時的中國軍隊爲了遵守着最高當局的訓令，非到對方先行開火時切不可動武，便讓他們這輩不速之客借用一下電話也就是了。這班日軍便打電話到他們的天津司令部，接着便來一團鐵甲車部隊和幾架轟炸機，立刻先佔領了火車站，接着便直接向中國駐軍營地攻擊。結果中國軍隊後退，死傷頗巨。當時北平還是在繼續談判中。

隔了不多幾天，東京日本陸軍省宣稱日本已遣派八師團（大約有十六萬之衆）到華北，同時有二百架戰鬥機也已集中在那兒。這時宋哲元已返北平，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司令部向宋將軍提出了早已在意料之中的最後通牒，限他們和他的軍隊于四十八小時內退出北平四週。宋便通電至南京稱將拒絕這最後通牒並且要求中央支援。到了明天尚未接到覆電之前，宋便發表了一簡單的宣言稱，「日軍這樣繼續不斷地開進來一再挑釁使我們中國軍隊感到忍無可忍，唯有盡心竭力地來捍衛國土才是」。這是勇敢的宣言，但是當時宋所處的地位已經是四面楚歌無能爲力的了，他駐在北平的一萬人的武裝配備是低陋得够可憐的，沒有坦克車更沒有飛機，祇有幾尊輕砲。他們以前不准築有什麼堅固的防禦工事。他的隊伍大都充任治安警防工作，分成一小隊一小隊散佈在幾個小村莊裏和北平城南城北的營房裏。這時日軍已經完全控制了平津路全線。中國軍隊祇能在迂曲不平的鄉道上集中。日方阻止南京方面增援北平華軍——借此來切斷談判之門的藉口。

雖則宋是處于被包圍的絕境之下，他斷然決定開火抵抗，這樣對於這座偉大的古城的淪陷才可以博得全國的同情和聲援，他不願意人家說一句廿九路軍不忠於國家的話。在城裏宣佈了戒嚴令，在事前並未逃避的外僑和日僑一律撤至使館區內，城門緊閉着並且築起了防禦工事，宋下令南苑的守軍

「受到攻擊時立刻抵抗」。

日本在二十七日開始正式攻襲，三隊飛機繼續不斷地轟炸南苑，同時用重砲射擊，隆隆砲火，通宵達旦，大約有三千多名中國軍隊立即壯烈地抵抗，三分之二犧牲殉國，他們的防禦工事僅僅是新掘的戰壕和沙袋之類，可是經不起日方的狂風暴雨似的炸彈和砲彈的轟擊，這樣約模轟擊了有一晝夜之後，日軍步兵由坦克車隊作前導之下切斷了殘餘的中國軍退回北平的歸路。這次壯烈犧牲也就是中華民國展開正式抗戰的第一頁痛史。

第二天，我便和路透社記者越過永定門，一路向南沿路去參觀這第一次會議的血痕，那兒依舊還是無人敢光臨的戰區，日軍尚未佔領，可是滿佈了顛躓爬行的傷兵和垂死的烈士們。有一個青年腿上穿了一個鎗彈孔，我們便和他交談，他說他是一個大學生，在幾星期前和一百個同學從東北大學和附中出來投軍的。經了好多次的請願，宋將軍終於把他們編成了一團，經過特別訓練的抗日青年隊，總共有三百多名學生軍，其中也有共產黨參入，可是這次戰爭陣亡了二百多名。他們這次英雄壯烈的殉國可以證明了北平愛國青年們二年來的活動不是徒然的，同時也是驚醒了全中國志士們一致起來抗戰的前奏曲，在這戰場上還有三位殉國的青年將軍躺着。

南苑變成了瓦礫場，而且躺滿了死屍，日軍飛機會底空飛翔掃射了不少人馬。有一處，大約是一縱隊中國軍隊中了日方的埋伏，被日軍用機關槍掃，死馬死騾和死傷的兵士縱橫堆滿在那兒，田地裏也躺着幾個農夫的屍首，有六枝新的小鋼砲和許多許多沒有使用過的手榴彈和鎗彈狼藉地遺棄在路上。

那些傷兵們簡直沒有人來顧問他們，似乎完全是無關痛癢的，人們以為這不過是當兵士的命苦罷了。這樣就可以看到前線軍士開戰，後方人民沒有救護組織是多麼的慘啊！在北平有許許多多設備完善的醫院和醫生，可是沒一組織和前方浴血將士連系起來，在每次接觸開戰後都是這樣悽慘，這是我

幾個月來親眼目睹的情形。祇有一次我碰到一個乾癯老頭兒，穿了一件灰色的長衫，戴了一頂舊呢帽，他在南門口狂熱地來詢問我那一條路是到南苑去的。他告訴我他剛才從保定帶了一輛救護車人員來的！也許他會救活幾條命，這似乎是空前的；他知道了去向便飛也似地向南苑去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見他了。

當日軍向西南推進時，平津也便安謐了片刻，但是中國軍隊的犧牲並非徒然的。這裏的抗戰加強了全國上下的意旨。在事變前，南京方面的人物常對我說華北的軍隊是決不會實行開戰抵抗的。現在北軍是如此勇敢地作戰了這樣的示威戰便迫使日方不得不到處另覓傀儡成立偽組織了，這樣在一連幾個月的可怕的戰爭中廿九路軍幾乎全部消滅了，現在宋哲元將軍和他手下的許多將領們一樣是死了。這時在華北立刻便發現了幾支中央軍，這便是委員長的遵守他的諾言，在八月十三日那天淞滬戰事也便開始了。

(4) 華北前線

使中國屈膝是日
本唯一的路線！
——近衛文磨

將近天津的時候，我在那擠極的火車上和幾個日軍攀談起來。我用一半英文和一半中文滲雜地問他們爲什麼要打中國，我把一包駱駝牌香烟遞給他們算做介紹。他們非常歡迎，因爲據他們告訴我，日本人最恨吸日本的統制配給烟。我想如果中國能夠得到大量的美國香烟的話，她可以用來使日本全部的長官和將士們個個都會甘心受賄無疑。

「我們日本人是愛好和平的，但是中國人老是跟我們纏擾不清」，一個抓牙紅臉的少年日兵說。

「那些可惡的中國人，他們在通州暗殺了我們的日本僑民」，另一個說。

「我們是來搶救中國的赤化」，第三個接着這麼解釋，「意大利和德國是了解我們的，但是美國和英國不了解我們」。

另外一個日兵一望而知是個初出茅廬的鄉下孩子，他是被徵入伍的，說是爲天皇服役。「我可不知道爲什麼要開戰？」他自己承認，「但是，蔣介石常常傷害我們日本人，所以我們是要打他，並不打那些無辜的中國百姓」。

另一個是從滿洲調來久戰沙場的老軍人，大概少尉的等級，能說一口流俐的中國話，有時替他的同伴做翻譯。他說，「我們是特地來教訓教訓中國人的，因爲他們實在變得太自大了」。

他們的回答竟和日本官方發言人一樣句句有理頭頭是道。這老軍人又說外國人可不知道中國人是怎樣執拗不，怎樣不可信任。他並且把他親自在滿洲役剿游擊隊的經歷講出來竟使其餘的日軍們個個都張口結舌。他警告他們「你可萬想不到一個中國的平民竟會驟然給你當頭一鎗真是防不勝防的」。

當火車進天津時天色已經暗了。我候着鄧穎超一起走。逕過在車站上戒備檢查的日軍是相當麻煩。穎超似乎很鎮靜，放落下巴裝着笑臉似傻非傻地對着那滿臉陰森的日兵，那日兵隨便地檢查了一下便把她的行李向地下一摔，接着發了一聲像豬獾叫一般表示我們可以去去了。

當我們走出車站時，看見十幾個中國青年男女被連繫在一起，急急地拖出來等候軍用卡車來載去。因爲他們的鄉下裝束和他們潔白的手臂相映之下，便引起了日軍的疑竇。在這種氣氛之下確是有些沉悶得透不氣來，直至我們越過了那鐵絲網踏進了英租界後方才鬆了一口氣。

英法兩租界的路上擠滿了五十多萬逃難者，他們大都是從北岸搶着上船渡向「自由」的南岸去。船票早已給飛票買空了，再向我們索高價分別賣出，這簡直比海盜們更兇惡。唯有西人才可以坐到官艙，還可以帶二三個傭僕在統艙裏。我便介紹了一個友人帶了鄧穎超依舊扮了阿媽上船混到青島去。她到了青島便可以登陸改乘火車，那兒依舊是在中國軍隊掌握之下。

「假使外國人來往不帶傭僕的話，那麼我們中國人將怎樣到各處去來往呢？」她笑着對我說，當我歡送她登船的時候。

「這可是不緊要」，我回答她。「你可記得溥儀是藏在一隻大的盛衣篋裏逃出北京去嗎！」

隔了十天，我也預備購船票動身。後來我的友人白脫拉決和我一起去，他的「中國的第一步行動」已經脫稿，他也和我的妻子一樣想去參觀一下中國紅軍。我們離開天津之前和李卻夫婦及英國詩人恩博生等一起狂飲德國啤酒。

我們乘了一艘英國商船「好愛塢」號，越過了黃海到山東，船上擠滿了人。我們在青島登陸，這兒還沒有被日本艦隊封鎖，可是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撤退，看起來像預備放棄的城市。這個特別市是由海軍上將沈鴻烈所統治。沈將軍在某一次內戰時反轉鎗桿後便做了市長。青島是一個富庶的都市也是日本心目中的「一塊肥肉」，暗底裏預備用銀彈來垂釣，可是他們的陰謀是失敗的。

山東省的地位是相當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會攻陷了青島和德國租借的膠州，不久又佔領了德國所築的膠濟鐵路。後來在華盛頓會議結果，日本可以依照九國公約，在太平洋裏得到不少的佔領地，同時規定把青島膠州和鐵路歸還中國。日本對於這條鐵路曾化了不少心血，在青島投資了三萬萬日元，並且有一萬六千多名的日僑分佈在這一省裏，所以日本始終把山東認為是她的勢力圈。當日軍想獲取華北時，日本爲了加強她的勢力又化了幾百萬日圓來連絡山東省裏的官員們。

那時中央控制了青島市，市長沈鴻烈是委員長所委派的，可是在山東全省除了青島市以外都是半自治性的，完全在軍閥省長韓復榘一握之中。當白脫拉和我到山東省城濟南時，便聽到了奇聞傳說韓將軍預備做日方的傀儡。山東全省沒有一處受到日軍的攻擊；同日方的財產都由韓將軍的特別衛隊保護；日本飛機除了飛到濟南一次外從沒有來山東空襲過，就爲那一次例外地飛到濟南的事便引起了不少人的猜疑，那一架日機擲下來的並不是炸彈而是一封寫給韓復榘他嚴守「中立」態度的書信。韓將軍便把這信和他自己向中央効忠的宣言一起張貼在公告欄上，可是這樣不足以釋大眾的懷疑。

據我的主觀立場來說，我可不覺得韓會怎樣賣國，那時中央大軍正開進山東來，同他自己的軍隊

大約有五萬人，也在大都是南京方面派來的將領所統率。那時這位老軍閥當然是希望這次戰爭在未蔓延到山東之前會結束，他和其他的軍人和政客們一樣不願意開黨，因為他的軍隊會首當其衝地犧牲以致消耗了他的實力。他也有他和日方的私人關係正和其他官長一樣，誰都有隨時接受日方的貢獻的可能，如果他願意接受的話。可是他並不願意。因為這樣會使一個大將軍的名義變成了賣國賊，他不過是想保持他自己固有的政治地位，不願意有誰來克制他，可是最後在極險要而嚴重的抗日爭奪戰時，他還是夢想保全他的實力，安兵不動，這樣可就真的成了賣國的形跡，所以他被委員長下令逮捕立即按軍法處決。

真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在九月中旬，在華北前線的日軍繼續不斷的遭到了那些一向被中國人認為「可疑」的冀魯魯各省的地方軍襲擊，雖則他們的武裝配備非常貧乏，可是他們的將領沒有一個向敵人投誠的。就事實方面看來，在抗戰初期幾個月之中，北軍的將士死傷得最慘重，這是很明顯的，是利用這些地方軍當作時間緩衝者，同時可以編制全國統一的全新的軍隊歸中央直接指揮。最後那些一向被誹謗做「軍閥」的將領卻一個也沒叛變，但是那些君子們就中國歷史上所謂「士大夫」之輩——像王克敏，梁鴻志和國民黨的先進「革命人物」汪精衛卻做了國賊漢奸。

日軍先佔領了平津做根據地，沿了中國三條幹路向華北和內蒙古進展。一支沿了平津路經過南口入察哈爾和綏遠到平綏路終點包頭為目的地，另一條是沿平漢路向西南推進以中國內陸的唯一大都會漢口為目的地，第三條路線是沿着津浦路向南經山東至徐州府最後預備和南線日軍會師。

沒有飛機和坦克車和野戰砲的協助，又缺乏機械化武裝的訓練和經驗的華北中國軍隊的抵抗力是十分脆弱日軍向冀南和山西的進展速率非常高，在短短幾天之中推進了三十公里在一九三七年起初五個月之中平均每天進展十二公里。在華北平原的中國軍隊抵抗武器精銳的日軍簡直等于自殺，可是他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祇有抵抗到底。有許許多多中國士兵連半個日軍的形跡也沒有看見而先被炸死

了。大有壯志未酬身先死之恨。日軍進攻的方針完全用飛機大砲做前導，接着便是一隊坦克車隊先鋒隊，這完全是用馬托機械化式的衝鋒陷陣，飛機先來轟炸中國軍隊第一線接着再炸第二線，於是野砲立即轟擊炸剩的防禦工事；接着便是坦克車隊實行「佔領」該陣地。最後日軍步兵和騎兵來臨時，可不費一鎊一彈安閒地進駐了中國戰壕，可是這時他們的飛機和大砲正在轟擊第二和第三道防線了。

我們慢慢地沿着臨海路向西安府前進，經過豫北大平原（那兒不久之後便由華軍決放黃河壩來阻止敵軍的前進）我們看見許多軍用火車運送華軍赴前線開戰的情形，使我想日軍運輸的情形對照之下確是可憐。日軍在華北後方運兵是用幾千輛的美國運輸卡車和汽車，還有幾千箱命的汽油。在天津我還看見許多新式火車從滿洲運來了幾百輛，裝滿了重機關鎗，兵器汽油和罐頭食品，運貨車，還有許多漂亮的長官用的流線型摩托車等，可是在這裏那些瘦弱的中國青年軍士，坐在那露天的四輪拖車裏，上面僅僅覆了幾枝樹葉片用來遮蔽日方飛機的視線，他們載的是來福鎗，輕機關鎗，有時難得看見一二輛老的福特車裝在火車的最末一節拖車上。中國這樣貧乏的程度在能够訓練摩托機械化之前是很切迫地需要大砲。

日軍的進展似乎是非常順利，直至他們這輩侵略者進入了利于防守的山嶽地帶的山西省時，他們的摩托機械化武器卻由利器而一變為連累物了。幾師團的配備相當整齊的中央軍也參加開戰了，也有幾尊大砲和幾架中國飛機發現了。在這兒日軍也得開始應付和南京簽訂聯合陣線的中國軍隊的游擊戰術。

當我們到西安時，我便好奇地又不耐煩地幻想起我的妻子在這紅色地帶究竟是怎麼樣，也許她已深入了游擊陣地？也許她會和土匪們口角不下？也許她已經是飛機炸彈下的犧牲者了？這些似乎都可能會變成事實的。我便在西安客棧裏想去探詢八路軍當地辦事處關於這些的究竟底細，這客棧的經理邱先生帶着驚奇的眼光和悅的面色對我說：「你可會看你的妻子嗎？」他說：「她在一小時以前乘火車到

青島去了。

我到西安僅過了一小時。那軍警當局便協助我去把娜姆找來。當晚在潼關把她扣留住了，並且用警衛隊護送。她這時她自己誤會以為被逮捕了去鎗決的，她也祇有聽天由命了。可是結果卻把她送到一個電話間，那兒最後我終于又聽到了她的聲音了。她便回到西安，後來我才知道她並沒有和什麼匪徒爭辯，可是她受到了意外的更可怕的事——她在延安患了二個月痢疾，變成了骨瘦如柴面無人色的模樣。她極需要找一個人來護送她進醫院來給她療治和靜養，並且可以選良好的飲食。我在明天把白脫拉介紹給中共後便和她動身乘火車到青島去。

我們到了徐州便下車預備轉車。在車站上擠滿了逃難的難民，他們這般茫無目的無家可歸的情形，我在以後幾年之中是司空見慣的。我們在北站下車後便去乘便拜訪兩個老朋友。據他們告訴我徐州已經很慘重地被炸，有八十五架日機來轟炸臨海線和津浦線上的各城市。我順便問起在那離城不遠的地方，我們看見的一輛毀壞了的火車。他們說這便是臨海路上的特別快車正巧在昨天被日機所轟炸掃射，許多趁客送了命。啊！假如我不把她在潼關召回來的話，娜姆也免不了是其中之一了。

在這兒我又碰見了一個剛從德州前線來的軍官。他告訴我一個很新奇的故事，有許多中國農夫們經過他的營盤的時候，時常來向他訴苦，他們說那些可惡的日軍到處總是瘋狂地要找肉食吃，把鄉村裏的豬和鷄都被擄掠一空，這些農夫說道可也是沒奈何的。但是事情就遭在後來的日軍手裏，他們嘗不到雞肉和豬肉的滋味，便把耕田的水牛趕集起來一頭頭把它們生生地活吃掉。他們根本不用牛刀殺牛，直接把活牛架起來用火來燻，他們用鎗頭上的刺刀或指揮刀在牠的臀部，腰部，和腿上隨便宰割一塊塊塞進嘴裏去，這種遲凌的酷刑，使這可憐的動物發出慘痛的叫聲，可是這種慘叫聲並沒有使他們的食慾減低。

這樣農夫們便失去了他們的耕田朋友，於是有了田不能耕，痛恨之餘，便放棄他們老家和田地逃

到山嶽區裏上前線去投軍，他們不斷地說『一定不是人』——指日軍。

過了兩天，我們又到了青島，那兒依舊冷落，還是沒有變化。青島的情形確是戰時的一支插曲。她在白天裏，是非常可愛，蔚藍的長空裏沒有一朵雲是多晴朗。在晚上是多麼風雅涼風習習從海面上吹來，有時從那山上松樹叢中帶來了一陣陣的幽香。這兒有幾英里著名的沙灘，慣常在這個季節裏有成千成萬的人來避暑納涼，可是現在變成我們的私有的海濱；一連三天我們沒有看見什麼人來參加這海水浴。那些村莊屋宇的門完全緊閉着，這般寂靜和冷落的景色，對於這所半數撤空了的都市確是有些別有風味之慨。我們每天在海濱瞭望着滔滔的白浪後面會有日軍登陸部隊的光臨。

我注意着中國人還沒有準備把許多有價值的日本工廠的機器搬走，這時還有相當充份的時間可以搬。當我向沈市長談及這個問題時他老是把話題移到其他方面去。有一天沈市長的祕書深信我的意思預備在日軍行將登陸之前把日本紗廠都燒光，我起初還是有些疑惑，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他並不食言。在我到上海之後便聽到中國方面在撤退之前把日本在青島所有的工廠都付之一炬。這次日方損失約有二萬萬日元之巨，這是日本產業在中國最大的一次摧毀。當然，中國方面在事前沒有企圖把那些有用的機器搬向內地去給中國自己使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可是至少在中國最高當局方面會下令把敵方的根據地予以毀滅，確是一種進步的政策，這的確可以稱之為高喊了好久的『焦土政策』的實施。

最後我的妻子應允我，她再也不出去飄流了，她預備留在上海直至戰事終了時為止，我便繼續向着這『東方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的內幕』推進。

第二章 淞滬戰爭的重演

(1) 侵略者

這一次戰爭在現代史上，是一個無往不利的強國和一個屢戰屢北的弱國的戰爭。

戰爭是一切創造的父親也就是世界文明的母親！
——日本陸軍省

在歷史上進攻日本本土的祇有一次，可以說絕無僅有的一次是蒙古哥勃拉可汗的大艦隊，可是結果被日本海面的大颶風和日本人的向天禱告和哀求所拒退。從此以後從來也沒有過外國軍隊達到過日本本土上來（譯者按唯有這一次日本戰敗後才有聯合國國旗飄揚在日本）日軍和外國交戰屢屢戰屢勝的，所以日本人自信他們的軍隊是無敵的。可是中國自從那在十九世紀中葉「鴉片之戰」之後總是出師不利喪權辱國。

但是這現代化的日軍祇有短短七十年的歷史。在一八七〇年前日本在大陸上的勢力是極微而當時中國在亞洲大陸却早已有二千五百年悠久的歷史了，雖則在任何一次戰爭結果失了利，可是中國人始終深信「中國在這長期的競爭之下最後終于會勝利的」，所以日本人在今日的自信力唯有中國這種肯定的寄托在明日的勝利的信念才可以克制它。

在一八九三年，便是日本第一次和中國交戰的前一年，那時日本每年的軍費預算是一千二百萬日元；可是她現在每天所費的軍費等于她五十年前每年的軍費。日本第一次的勝利是利用進口的鎗砲博來的。隔了十年她自己會製造一些輕兵器了，可是老東鄉又用了進口貨的戰艦大敗了帝俄的艦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兵工廠的產量和能力已經發展得很可觀了，這也是她的大成就。在青島又取勝了德國，便是她第三次的勝利。

在明治維新之前，那時是封建制度尙未消滅時唯有武士道可以有武器，到了維新後封建制度取消

軍隊變成了國家化向全國人民徵集，於是實行了徵兵制度普遍地軍訓，軍隊重行訓練過，可是他們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確乎有些昂視一切之慨；可是在兵士和技術方面盡量採取進口的西式武器和戰略爲原則。因爲德國在色丹的大捷，日本聘請了許多德國軍事專家到東京來指導他們怎樣訓練徵集的軍隊和怎樣使用新兵器以及如何策劃戰略等等，於是這輩普羅士的軍事專家便變成了日本軍官的楷模，同時也做了日本軍隊的教科書——這教科書的內容也包括最近幾年來的納粹黨的豐功偉績在內。（譯者按可是現在的國社黨是已經瓦解了，德國也完了）

可是現在的日軍也已經成了獨立性的組織而那輩普羅士老軍人，尤其是那希特勒的黨人們，也許會妒羨他們了。封建制度的消滅造成了陸軍和海軍的國家化，他們都是向天皇一個人效忠。在事實上，這海軍和陸軍兩大系完全是獨立化的，唯有天皇可以命令他們。在短短二十三年之中連得了三次大勝利之後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把現代化的日本擁上了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列強之一的地位，可是緊接着的便是那些主張立憲的政黨們猛烈地向這輩武士道化的權高一切的軍部挑戰的時期了。

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公約簽訂後，日本帝國的海軍被承認在遠東佔絕對優勢而且被保證穩固的地位，這時日本擁着選舉權的人民和軍部的爭鬥變成尖銳化和白熱化了，這强有力的趨勢結果把軍費竭力裁減把軍隊盡量縮編並且制裁日本貴族幕僚的權限和勢力，國防費用每年減低至二萬萬日元；現役軍隊裁至廿五萬人，幾千名的可惡的軍官下野，於是這立憲政制是充份地進行而訓政期也減到兩年以內。

可是到了一九三一年這個時期也就驟然中止，軍部的惱怒加上了社會經濟的因素綜合地造成了瀋陽事變。在日本陸軍少壯派激烈份子的計劃和幕僚們的鼓勵下侵入了中國的滿洲之後日本又成了軍國主義來阻止中國的國家主義，這次『不流血的勝利』確是非常成功，皇軍的威望也立刻抬高起來了，他們不顧了國際間的義務發動了侵略戰事，在國內又集中了大權把先前的政策漸漸地廢棄，而實施他

們『向外拓展』的計劃程序，在理論方面說上述的『軍國主義』像天皇一樣，在事實方面說皇室也便是權高一切的政黨，而將領們也便是這政黨的首腦們。

軍國主義在日本社會裏是社會經濟的反映。這是在日本天皇領導之下的一個獨裁的機構在理論上說，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反對黨』是絕對不能存在的，事實上是許多黨閥的集合。他們都有着他們自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野心，和他們自己私自和社會運動資本家和工業家們的溝通和諒解，和他們自己的『程序』。有時這些黨閥們的陰暗的內鬪會變成了公開的叛亂，像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那些軍校的少壯系行刺了日本內閣三位閣員，同時逼迫政府實行改組，慣常的用和解除內閣，遷調職位的方式來解決，因為陸軍部長必須是一位最會活動主腦人物。

日本最大的財閥和資本家深切地和軍部合作，雖則本來站在對立的地位，他們便也深深地被捲入了軍國主義的漩渦裏。在世界上除了日本可以說沒有第二個國家裏的資本主義會和戰爭有着這個密切的連繫。日本的工業是在她和中國第一次開戰後開始發軔的，後來在她的每一次帝國主義拓展之下努力地發展她的工業。在戰勝了帝俄後，日本的兵工業，造船業，礦產業，交通和運輸等便高速度地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佔到了不少的利益，同時她對於中國變成了債權國的地位，就因為日本根本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戰敗，日本人的腦海裏祇有戰爭和興旺。

在滿洲日本軍部大事經營。軍部直接管理了各大工廠和國營事業，那些軍官們派到了種種職位。可以一夜致富，假使你能够在特務隊裏找到一個位置在日本人想來可以保證發財，因為特務隊控制了大多數的軍管理事業。雖則一個日本大將的年年俸不滿美金三千元，可是他們在特務隊退職或告老時職位最小的財產估計起來沒有一個會在萬數以下的。

關東軍的人物像石原板垣，土肥原和植田等，當我在九一八之前後初次會見他們時個個都是非常清寒而且都是盡忠報國的誠實人，可是現在他們一個個都變成大富大貴的將軍了。有許許多多的青年

軍官們在一二年前是供職在關東軍或華北駐軍；現在突然搖身一變都成了什麼財政專家，經濟專家，礦業專家，政治專家，或者索性稱他們中國專家。以前誰都不會去請教他們，可是現在真奇怪不知有多少的銀行，工廠和許多的企業公司的董事會名單上沒有了他們這輩大名幾乎會有開不下去之感。

同時在進佔滿洲之後，那些不滿意當局的下級軍官們，在具有獨特的政治計劃的軍黨鼓勵之下提出了強硬的要求，要求『改組』軍隊。這個改組運動的理解便是利用所謂『防共協定』——這便是他們唯一的理想工具用來肅清日本的『危險的思想』。軍部發行了不少連繫性的小冊子來誘導全國，它的範圍非常廣；無論經濟、政治、藝術、科學、哲學甚至於連家庭生活都論及。這種趨勢確是向着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的路線上去，因為軍隊和財閥，商閥及資本主義的一致行動。

日本每個軍人所必讀的軍部文藝——專事抨擊所謂腐敗的政客，資本家，政府議院，外國的帝國主義，中國的國家主義和國際性的猶太人（皇軍的排猶運動近乎荒謬，因為日本根本沒有猶太人。可是在滿洲是用得到的，他們可以排出哈爾濱的白俄猶太人。軍部便設法剝奪了他們的財產）。這種軍部文藝用婉轉動聽的方式來替『極權的軍國主義』來辯護。例如利用什麼『軍社主義』，『國家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動聽的名詞。但是根據了那輩叛變可是具有政治背景的無知青年徵兵（每月僅僅拿三個日圓的餉銀）瘋狂的要求，這種狡計便得到了一個很明顯的立場，尤其是把它當作日本在東亞的理想中的唯一神聖文明的而且和平的使命。

一年年不斷地增加軍費的預算，到了一九三六年當時預備對付『中國事件』，那日本服從性的議會批准了軍部的增補軍費表。單是國防軍用一項的數目已經超過了她整個國家的稅收，大部份的錢是用來擴展軍火和兵工事業，預備把日本的陸軍造成和歐洲各國的全新的機械化隊伍相等的地位。在一九三七年的中期日本還不及像意大利能够自給自足的地步，例如她的兵工廠每年祇能出產三千輛坦克車和四千輛汽車，這樣的產量對於日本似乎已是空前的了。但是日本對於運輸車，和其他許多完整的

武器，尤其是飛機還是大部份依靠歐美各國的據濟。日本所有高速度度的飛機都是德國製，法國製或美國製的。直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前在日本沒有一隻完全是日本製的轟炸機，而那時日軍飛機全部的總數也不滿二千架。

但是在這四年戰爭以來，（譯者按當時筆者係一九四一年寫）日本根本完全把他們的經濟方案重建，把全國的資源和她的殖民地的全部物力來築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的兵工業，爲了這一點他們需要歐美的技術援助，他們尤其需要美國的工程和機械技術人才和計劃，同時他們更需要我國的好鋼鐵和鍛鍊鋼鐵的祕密。據許多專家觀察，假使我們（指美國）在起初幾個月中或則在戰爭的第二年中拒絕了接濟這侵略者一切武器的原料，尤其是鐵和鋼片以及飛機用的汽油，（我們所供給的佔日本進口的十份之九）同時英國或法國也同樣拒絕了一切軍火援助給日本，那末日本現在的軍械即使不全無用，至少也已殘破得非常嚴重地不堪一擊了。

在開戰之初日軍當然有着很充份的後備軍，同時一切物質也遠勝華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參謀總部的計劃，把現役陸軍增至七十五萬人和近乎二百萬的訓練過的後備軍，在日本及格軍役年齡的近乎一千一百萬人，估計起來假使列強各國繼續接濟日本的軍需的話，日本的最高當局會下令動員全國女性來製造兵工業，再動員中國人（指滿洲）和朝鮮人來擔任種田供給食糧和維持治安，最後于是在緊要關頭可以盡量動員全國男子六百萬至七百萬名配起武裝來。

在那時就武裝配備而論，日軍是遠勝過蔣委員長的第一流精銳的師團。他們每一個師團備有六百十五架機關鎗，和下列的各式大炮：三十七公厘口徑的大炮，七十公厘口徑的短炮，七十公厘口徑的野炮和平射坦克車炮各二十四尊；十二磅一百另五公厘口徑的短炮和四磅高射砲。在戰爭開始時已經有二十五個師團是這樣配備。到了一九三七年末，半數以上的這種師團已經開入了中國，每一個師團當然都有着他們自己的坦克車部隊和機械化部隊，但是還沒有真正的「鐵甲化」的師團出現。

日本陸軍對於他們這種進步的武裝配備和他們「無敵」心理的深刻的自信力，實行了他們的全面攻勢而且決斷了日本整個的戰略。在最初開戰的時候日軍將領們依靠了他們高速度的利器想貫穿了中國的抗戰實力，他們主要的策略是想仿照德國在色丹的戰略，他們夢想着曇花式的三個月戰事，他們計劃就在中國東部運用速戰速決方略把中國的主力軍隊實施閃電式的大包圍後大會戰獲取勝利。

日本不顧了各國可能的干涉，她甘冒了唯一的險路來實施她的方策，假如日軍深深地攻入了中國也不過是遣散了人力，可並不能算戰勝了中國的主力軍。日軍也許會戰勝了什麼大會戰，可是最後在政治的決策是失敗的，這是對於無論那一次戰爭的最後的公正判斷都是一律的。（譯者按現在日本的投降可以證明筆者的言論相當準確而有價值，真不愧為一個名教授同時也是一個名記者和名作家）。他們的危險性可以這樣觀察：道過份延長的長期戰爭中，可以使中國充份地應用她自己固有的二件法寶——便是地大和人和衆——有了這樣的條件便可以阻擋侵略者的勝利的迷夢，一方面更可以使日本再也沒有和世界各國爭雄的能力和資格。

我可並不以為日本根本完全不顧着這一點的可能性，可是我總以為她把中國固有的力量完全估錯了。

這究竟是日本的自信力太強，夜郎自大的估計，或則是中國弱點的準確的估計？

(2) 國防

請把地圖打開來看日本和中國比起來是何等渺小對於我們最後勝利請問有誰會發生疑問——蔣委員長

上面這一句話是委員長在這次戰爭開始了不久之後親口對我說的，這便是一種促使他實行抗戰到底的忠信的意識。

陳誠將軍後來對我解說：

「這是持久戰的戰略」。

後來，我相信，打仗制勝的主因還是專靠士氣。

中國在一九三七時，已經有了很龐大的陸軍，雖則一時還不是日軍的對手，可是在一八九五年時的日軍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也許這樣的中國軍隊已經可以把戰勝帝俄時的日軍擊敗。在中國陸軍發展短短的一段歷史看起來，中國確是有了極大的成功。

中國的現代化比日本的維新要遲四十年，那頑固不化和不長進的清朝祇有在一九一一年才推翻，而那時所遺傳給中華民國的軍力實在很微，在清朝末年僅僅設立了三三個軍校，那些前輩中國軍事領袖都是在那裏訓練出來的，那時的教官大都是由日本軍官担任，他們的政策要想把中國青年訓練起來幫助日本造成一個大亞洲帝國，而蔣委員長便是其中的一個青年，那時他僅僅學到了些形式上的軍訓，後來他又到東京的軍事學院裏深造。

在滿清政府崩潰之後十年，中國的武裝軍隊大都還是操在半封建式的軍閥們的手掌之中，他們出錢募兵，兵士們只知忠于他們私人而不知爲國效忠。直至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在廣州創立了黃埔軍官學校後，便奠定了真正國民軍的基礎。在黃埔軍校裏訓練出了許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青年軍官來領導國民軍，後來把大部份的軍閥推倒。蔣委員長便是該校的第一任校長，那時還有蘇俄軍事顧問團由鮑羅廷將軍領導。這輩蘇聯軍官是由孫中山先生在莫斯科的諒解而商借來協助訓練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和國民政府成立後，委員長便在南京成立了南京軍官學校接替了黃埔軍校。當時共產黨也便對立地設立了他們的紅軍軍校。在這二個軍校和各地省立軍校所訓練出來的軍官們就是現在領導中國軍隊抗戰的將領們。

蔣委員長先聘請了一位德國顧問巴亞上校 (Colonel Bauer) 和他的下屬。在一九三七年遣德國軍事顧問團由法根哈森將軍 (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nsen)。該團大約有一百多位軍官。委員的最現代化的軍隊的青年將領們大多是他們訓練出來的。除了南京軍校之外委員長又設立了許多砲隊，坦克軍隊和化工部隊士兵訓練專校。對於軍事技術上看來他們是訓練得十分成功。

中國有現役正規軍一百八十萬人在抗戰，可是他們大多是不一律的，武裝配備各不相同。中國最精銳的德國化的部隊由黃埔東南軍校將領所統率的祇有三十萬人。這些部隊便是蔣委員長八十個師團（武裝配備和訓練是不完全一律的）中央軍的核心。此外還有廣西軍在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之下自從一九二七年起在廣西所訓練出來的，大約也有三十萬之衆可以和委員長的模範師團相並論。最後還有在西北的共產軍，他們戰術還不差可是他們的軍器可以說比各地方的雜化部隊還不如。至於其餘的中國軍隊便是地方軍，他們從來也不服從中央的命令，他們的訓練和配備是非常混雜，軍器的質量都在中等以下。雖則全國無論那一支軍隊都承認蔣委員長是全國總司令，有許多場合因爲缺乏了完全連續的參謀本部，還是帶着些地方性。

中國軍隊的武裝配備有輕重機關鎗，自動來福鎗，和小鋼砲等。委員長的德國化師團所有的野戰砲，輕砲和重砲和日本師團所配備的是大約一與四之比，機關鎗是一與三之比。那中央軍大都配備着不十分精銳的大砲，而那些地方軍祇有輕砲和小鋼砲之類。平均每一師團的中國軍隊所有的機關鎗不出一百架。在那配備完善的軍祇有不多幾架平射坦克車砲。其他部隊沒有平射砲也沒有高射砲。他們的坦克車不滿五千輛，而駕駛戰鬥人員也沒有怎樣好的訓練過。

中國對於補給軍火的能力非常有限。例如，全部的兵工廠的每月總產量不過二百架機關鎗和三千枝來福鎗，所以即極小的輕兵器也得由外國運來，中國不能製造完善的砲彈和炸彈。小鋼砲的產量却很大，所以中國軍對於這一件新兵器的運用相當精練，對於步鎗和小鋼砲的軍火中國對於現役軍隊的供應是足以自給自足了。

因爲缺乏標準的採購，造成了錯綜複雜的嚴重性的軍火供應問題。自動的來福鎗，機關鎗，和大砲是各式各樣有德國製的，有法國製的，和其他各國製的；而自製的或進口的鎗彈和砲彈配上了這一件武器，可是又配不上另一件，有許多全新的軍器因了配這種式樣軍火彈藥的來源切斷了便變成了廢

物。飛機也是這樣。航空學校畢業的駕駛員們時常會感到無從着手之苦，因為剛練熟了這種式樣可又調了一架。中國的高級政府官員每到外國去一次結果帶來了一批新式的飛機。他們到處都去購買像買什麼女式的花帽一般爭奇鬥豔地各不相同。中國受了不少痛苦，尤其是意國製造的飛機，當這次開戰時委員長的航空部隊名義上有近乎一千架的戰鬥機，可是實際上祇有一百五十架是中用的，最大的原因還是因了沒有合宜的兵工業來支助，有許多飛機經了極輕微的損傷後便變成了廢物就因為修理的技術太幼稚。

缺乏統一的集中組織，低劣的配備，不充份的根據地，和嚴重性的幼稚的技術，必需極度的經濟力來運用一切軍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軍隊在可能範圍之內唯有盡量避免正面爭奪戰和銷耗大量軍火的陣地戰。這是很明顯的中國當局對於用軍火來和日本爭雄是無望的。唯有另外找出一種戰略上的資源來援助主力的正規軍。這種資源，在以前已經說過的，便是幾萬萬的人民和他們所住的土地。可是單是地廣人眾是不能勝利的，可是如果完成全國動員起來那末敵人便無法統制這個國家了。所以中國最真實的戰爭目標却不是建築在形式上戰爭的勝利，而是使敵人的犧牲變成徒然的情勢來博取最後的勝利，這樣需要一種戰略考慮下列三點，（一）盡量延長這個戰爭並且保全主力和軍械同時把敵力拖引深入內地；（二）在敵人的後方和側面竭力發展流動性的，制奇勝的游擊戰術同時在主要陣線延遲正面爭奪戰；（三）在淪陷區裏拒絕敵人或設法使敵人不能建立於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根據地使他們必須仰給于本國，這樣必須要有革命性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來實行全面抗戰。

要達到以上三個目標，那末必須要着「一句成語所謂『全體總動員』」，這是無論那一本論及中國抗戰的書本都以為這是根本必須實行的。中國向來稱有四萬萬人民的大國，可是在這次戰事爆發後能動員的不滿百份之一，這就因為在過去十年之內政府沒有把羣衆訓練和組織起來。日本的人口雖則比中國小得多，可是他們能動員參戰的百份率却遠超過中國，所以，日本在戰爭的初期動員人數是絕對有

利的。可是假使日本繼續不斷地向中國廣大的地區伸展侵蝕的話，她這種有利的地位終于會相反地轉給中國。

在華北各省日軍所能集中的地點都是些鐵路和公路線上的重鎮和城市，他們向着內地村鎮的進展是非常慢，他們對於這些鄉村城市是無法征服的。在這些「孤島」或「隙口」的鄉村的幾百萬農民可以組織起來，訓練起來，拿起了軍械來和中國的主力軍打成一片，這兒也是游擊隊的家鄉和根據地，這兒也是日本的勝或敗的最後決戰場。

在上海的堅持戰驚人地犧牲了許多嚴格訓練過的兵士和新武器，幾乎把中國組織了的抗戰實力在開戰的初期便摧毀了，可是這也許是具有相當的政治作用的意義，這也有些心理上的價值能够增強全國的自信力。這也許是希望，委員長也是這樣希望在上海五方雜處的公共租界的邊緣上爭鬥也許會使日本遭到無從避免的嚴重性的國際糾紛，以致也許會使列強出面干涉日本。同時延長了時間也許可以使有價值的工廠機器和技術人員從容地向內地遷移，而在內地各處的民衆可以趕緊組織和訓練起來。或則可以準備游擊戰的據點的話，這次戰爭的慘重犧牲可是說值得的。

但是，在事實方面，這次戰爭的意義，確是相當重大，尤其是博得國際間的極大的同情，這同情也就是促使英美蘇各國聯合起來，組成聯合戰線，攻擊日本的基礎，以至於造成了日本今日的慘收結果。

(3) 戰事的回憶

上海這是中國面部
上的一個政治大瘡
毒——約翰耕塞

我們在九月底沿着黃浦江到上海，沿江經過了一批日本軍艦，它們正伸出了它們的炮口，向着瞭遠的灰色陣線轟射，而頭頂上卻是許多飛機隊伍，正從焚燒的閘北和江灣的上空飛過來。

這可給了我一個巧合的印象，大約在五年多以前，我正在上海參觀這日本

的試探戰的時候，這同樣的戰事在同一地點發生，雖則這次的情形相當擴大，誰也不會否認又置身在一九三二年的「二八」了。舊時印象消逝得多麼快，當新的恐怖降臨時擦去了那舊的創痕。——那許多次的大戰，成千成萬的健兒的壯烈犧牲，已經像去年（一九三六年）的盛極一時的奧令尼克世界運動會同樣地被人們遺忘了。在一九三七年上海大多數的人，已經把「二八」之役忘記了，而今天（一九四一年）也許已經把「八一三」也忘記了。眼前一次的戰爭，正會把以前千萬次的戰爭抹殺；在我的腦海裏以爲這一次便可以透視到下一次的演化。

這次回憶起來，簡直是世界舞台上最偉大的一幕，即使希特拉的閃電戰，也比不上這樣壯烈。世界上可再也沒有第二個大都市像上海這樣一邊處在火線的邊緣上中立着，一邊是正在博鬥，近乎百萬之衆死在鎗林彈雨之下。

那時誰都知道有二個上海：一個是外國人所統治的大約祇有幾千畝廣的，便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是在近乎一百年前由中國租借來的，還有一個便是中國統治的大上海，包括城內閘北、江灣、南市和浦東一部份。那時上海三百萬人口之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住在租界裏，其中包括六萬歐洲人和四千美國人。

日軍佔據了楊樹浦和虹口（在蘇州河以北的地段）做根據地來進攻中國軍隊，正和「二八一」一樣。在蘇州河以南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國地界的各處交界綫上，都是英國、法國、意國和美國軍隊守防着。在黃浦江上，在外灘的一段，依舊是中立着，上面停泊了許多美國軍艦和英、法、意各國的軍艦，很有趣地注意着在下灘相距僅幾十碼的日本軍艦炮轟着中國陣地。這樣穩定地中立了足足有三個月之久。

戰爭包圍了這整個國際性的「小天地」，可是這也給第三者或旁觀者一個很好的地位，有時炮彈呼呼地飛過了頭頂，有時偶然有一個流彈飛進租界裏，便死傷了不少人。日軍開高射炮越過了公共租

界，有時偶然會有彈片飛在外灘一帶。有一次在美國旗艦「奧克司太」號（*Aurora*）上一個水兵，中了一片高射炮彈片，有一次一個中國或日本的砲彈流進了一個百貨公司內，便殺了六百人。在戰爭最初，有幾架中國飛機不幸地墮下了炸彈，把正在下面十字街頭抬起了頭看熱鬧的人羣死傷了二千多名；這一次可是據我所知道的是二顆炸彈。但是這大部份的國際性的上海——也許將來是日本和歐美的衝突地點——老是保持了過去的一貫作風，度着異乎尋常的日子。

在第一次淞滬戰爭時，我是担任了戰地記者的工作，在新聞學立場觀察起來，這樣的故事，在上海是極可能再演一遍，而且祇有上海才有這樣的發展。那時可以說是極方便給記者們工作，你祇要帶了一張派司，（護照），你便可以在上午到中國軍隊陣線上去，能夠「親眼目睹」戰事的怎樣進行；在下午你可以坐了汽車駛轉來，經過了公共租界，便可以到日方前線。如果你要更澈底的話，你可以立刻趕回來參加中日雙方的新聞會議，在這裏你可以得到官方消息。還有最大的優點，便是你可以忙了一天之後，回到中立地帶把你的不加檢登的消息，自由地拍放出去，於是公畢後你可以舒適安閒地上床睡覺。這是一個我所經過的可以得到立體新聞的空前的戰爭。這次八一三戰爭，似乎和上一次的

情形相同，可是進出陣地就沒有這麼容易了；因為這次在空中飛舞的東西太多了，安全似乎是有問題了，但是要幹還是依舊可以嘗試。

在現代戰爭之中，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從來沒有可以像上海這樣自由地行動。有一次當軍隊向內地推進時，在日方前線受了一點限制，可是對於中國方面，你可以很容易到他們的前線去。中國人願意和外國人失和。中國軍士把歐美人當作聯合友邦人士看待，他們可不怕什麼第五縱隊的混入，因了這種自由行動，許多特派戰地新聞記者們互相競爭，為他們的報紙採訪目睹戰地事蹟。這也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在如此砲火連天中來往，僅僅犧牲了一個名叫司帝芬（*Penbrooke Stephens*）的青年記者，他是倫敦每日電訊的特派員。

有一次一位瑞典新聞記者名叫拿司脫羅（Eric Nyström）剛從北平趕來上海，當時關北正在撤退中，他向上海市長俞鴻鈞探詢日下的中國新陣地，俞市長便打開一幅放滿了小針的大地圖指着一點。

「我們陣地的東端，正巧在鐵路以西近兆豐公園」，他解纜着。

「呃」，這瑞典人考慮着，「我想明天就乘公共汽車到兆豐公園去」，後來他果然去。

人們都站在公寓大廈屋頂上，眼看着日本飛機向着遠遠地被屋脊和瓦片遮隔了的中國戰壕陣地，放下了許多噸的炸彈。住在靜安寺路上的國際飯店客人們，可以在佔了二層的食堂裏的透過了寬敞的大玻璃窗，參看着炮火，一邊滿意地喝着他們的濃咖啡，一邊可以研究着日軍排砲的射擊目標。

在上海的外國軍事觀察家也感到再也沒有比上海這樣好的機會。他們可以坐着包廂看日艦炮轟阿北，他們對於殺人的藝術有了新的認識。有許多觀察家對於以前他們所想像的日本的軍力，同時也開始深信中國大有得到最後勝利的希望。

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日本在這時進攻上海是在軍略上一個絕大的錯誤。他們起初滿以為可以得好像華北一樣的「高速度勝利」，可是上海的戰事，把日本的軍力大大地分散了，戰區擴大了，實力是不能集中了，同時又增強了中國在政治上的團結和抗戰的決心。在政治方面說，日本這也鑄成了一個大錯。在上海和上海週圍在揚子江下游一帶佈滿了些游移份子的政治勢力，他們這輩人在過去革命運動時代時常會暗地裏勾結外國資本主義出賣國家的利益。可是爲什麼這次日本卻無從利用這輩人，這最大的原因，也許是爲了日本一開戰便把他們產業和利益摧毀，激醒了他們的政治意識。

日本如果暫時退出上海，把他們的產業和利益交給中立國代管，那末日本要有利得多。因爲這些中立的歐美列強們，也許會運用轉向有利於日方的政治作用。同時日本便可集中全力把華北先行掃蕩，然後再來侵蝕揚子江下游，這時也許可以利用這輩游移份子和外國的勢力來協助她迫使南京停戰。但是南京的軍隊，早已在八月初開到了上海近郊，對於日軍確有一種對敵的情勢，而日本皇軍又

是多麼驕橫，更切實地說，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性格，日方便不顧一切地放棄了政治上所必需的和平調解之門。無論如何，日軍在公共租界上的登陸部隊，一天多一天，和中國軍隊的增援開北邊界上面對着日軍的形勢，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戰爭的最初幾天，中國軍便施展了他們的熱烈的戰鬥術，這真是大多數人們所料想不到的。在日本兵艦上排炮直轟的猛烈炮火之下，他們便立刻把日軍擊退，敗回租界，而且幾乎趕下黃浦江中。這樣大約有一星期之久，這輩侵略軍幾乎全軍覆沒。日本搶救工作又遭到了事實上的困難，因為他們無法把接近中立租界的中國軍隊的右翼逐出。日本的增援不得不設法在北部登陸，從吳淞至瀏河，沿着揚子江約有二十英里長的防綫。這種登陸戰術，洩露了有些觀察家們所指摘的日本軍力的弱點。

在那兒中國軍隊僅僅臨時草率地築了些防禦工事，而日軍的登陸部隊，足足費了一星期之久，在十多艘軍艦護送和許多空軍掩護之下上陸。即使在瀏河方面，成立了新的一翼，同時又有充份的軍隊足以進攻，而日方在幾星期中依舊沒有多大的進展。後來隔了二個月之久，由軍艦上的大炮的猛烈轟射之下，最後僅僅迫使中國軍隊在開北的右翼撤退。

這一切都給了外國的軍事觀察家一個具體印象——日軍對於具有極大決心和勇氣的敵手的「進攻的士氣」，是非常不振。

他們認為這是非常難以制勝的——正如他們後來和蘇俄在張鼓峯和外蒙古邊界上的「試探戰」同樣困難。在上海當日軍攻入了中國的右翼，使中國軍隊向着租界以西蘇州河南撤退時，日軍又沒有立即猛襲，迫使中國方面的撤退，變成了潰敗，日本卻謹慎地推進，於是給中國方面充份的時間來築新陣地，於是日軍又不得不再化了絕大的代價和很久的時間，再來個新攻勢。

在華北日軍所遭遇的對手，武裝配備非常低陋，簡直沒有新式的防禦工事，所以日方坦克車隊在大炮掩護之下前進，擊潰了中國軍隊，因此日軍步兵可以安全地佔領中國陣地；可是在上海方面，

中國守軍有五十多萬之衆，其中有中國最精銳師團，日軍的砲火可不能動搖了他們的防禦任務，日方的坦克隊一再進攻，可是一再被中國守軍擊退。大炮已經不能和坦克車按步連系起來。只有一二次用來當作掩護步兵進行時的活動烟幕。

據外國軍事觀察家稱述，那時上海日軍的大炮和飛機的轟射標的的不準，又誤了他們又一件任務——便是轟炸和毀壞對方的在後方到前綫主要路綫，結果沒有達到目的。直至最後，這次淞滬戰爭行將結束的前幾天，中國軍隊依舊用軍運卡車在那些路綫上往來，在最前線陣地上和後方之間，雖則有五百多架日機，每天在京滬一帶上空飛着。

日機最高明的手段，便是轟炸無辜的鄉村，並且用機關鎗掃射無力抵抗的難民，日方的飛機，野炮和軍艦上的大炮，猛烈地轟射開北，幾千噸的炸彈和炮彈，像雷雨一般倒下來。據軍事觀察家說，這是最酷烈的炮火，集中在這小小的開北，中國守軍的犧牲，萬分慘重。

像中國軍隊在這樣可怕的轟炸之下，抗戰的壯烈的英雄，本色着實偉大，簡直有些使人不可信的壯烈。他們個個都是非常鎮靜，視死如歸。這種『士氣』確是中國民族的特產，在西方各民族之中，恐怕找不出這麼偉大的『士氣』。我記得有一天，和一個美國海軍副官，名叫卡爾生少校 (Major E. F. Carson) 趕到蘇州河以南的中國陣地上，考察中國的新防線。

我們正向着羅別根路 (Rubicon) 走，經過了一排中國炮隊，在樹蔭下正向着北面的日軍陣地轟射。這時突然來了一隊日機，在我們頭頂上空旋轉着，一忽兒炸彈落在這炮隊附近，我們便加緊脚步向路邊閃避，可是當我們正巧在一所破屋旁邊躺下來的一剎那間，另一顆炸彈落下來正中了我們剛才的立足地。後來便爬起來繼續這樣躲避，在第三次回顧時，看見那座破屋旁邊落下了機彈。同樣的情形一連繼續發生了好多次；日機老是跟着我們轟炸，我們以爲我們隨時有被日機用機關鎗掃射的可能，當我們再也奔逃不動的時候。後來我們逃到一條小河旁，便在緊靠着河旁的小樹蔭下斜躺下來。

這時又來了另一隊日機，可是飛過了我們。我在河岸旁斜視着。看見炸彈落在相距不遠的一個樹叢裏。後來又飛來的日機，一直向西飛去。我們便爬了起來，感覺得我們是死裏逃生，驚險非凡了。後來我們看見一個青年中國步兵，大約不出十六歲的光景，在這個樹叢中的一個墳墓後面爬起來，整了整他的鋼盔，把他在炸彈聲中失去了的槍拾起來，回到他自己的崗位上來。他看見我們，便非常歡迎，我們便和他攀談起來，他告訴我們他正巧在前線和十七位同志在一個戰壕裏的時候，來了一個炸彈，把他們全部炸死，祇剩他一個沒有死。在這時沒有一個同志或官長在旁邊，他的鎮靜和從容的態度，真使我感到驚奇萬分。

在十一月初旬，中國軍隊的死傷人數，已高達十五萬以上，防禦實力也犧牲頗巨，有幾個中國最精銳師團也已傷失十分之一以上，而且大量的軍火和武器損毀，中國方面本來預備在上海以西八十英里揚子江岸，一直向南經蘇州到杭州為止，築一條堅強的鋼骨水泥的第二條防線，可是祇有築了一半，而前線增援生力軍開遲了一步，日軍卻已經在杭州灣登陸成功，於是便把這次的戰爭告一段落。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後，迅速推進，直穿了松江和閘行，正在中國軍隊右翼後面包抄，於是中國軍隊在十一月九日起被迫實行總退卻。日本於是在這一次勝利後，便在閘北上空升起了一隻勝利汽球，下面飄揚着一長條自誇自大的詞句，這是日本人的習慣。有一個路透社的女記者叫達愛茂（Christine Demer）的，她看見那隻汽球在火焰和黑烟上空盪着，她便立刻拍一個急電到倫敦去，關於她發現這日本的新兵器——『浮盪炸彈』。

但是中國方面的殿軍，在南市繼續維持了二天，我們便去參觀這極偉大的戰爭場面——這是最後的一幕。我們在徐家匯河（便是南市和法租界的分野，相距僅五十英尺）的北岸。我攀登在面對着河岸的一座中國房子的陽台上，和幾位攝影記者在一起，他們預備拍攝這個完善的戰爭場面。

在河的右岸遠遠地我們看見日軍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一排一排推進着，他們躲在坦克車後面，每進

行了幾尺，便停一停，空中彌漫了一股股的火光，在貼近的我們正對面，在徐家匯河的小支流的左岸上一個水泥堡壘，口中伸出了一架機關槍，這是中國守軍，在這支流旁一長排的茅屋裏駐滿了中國兵，炮聲隆隆地咆哮着，炮彈在頭頂上飛過，在這河靠近中國守軍一邊，有幾只舢舨停泊着，船上的人正在若無其事地吃飯，直至突然飛來了一排機關槍彈，才把他們嚇進船艙裏去。後來我可不知道他們的生死。

日方的轟炸機出來了，把一排茅屋燒去，有幾架飛機直竄下來，距河岸僅二百尺的光景，向中國堡壘掃射，日機在這河的四週，大施轟炸。我們在陽台上個個都發起抖來，簡直像骰子在筒裏一般，我看見日軍正在徐家匯河對岸的破牆殘壁後面，漫漫潛行過來，預備衝過那條小河來。有幾輛坦克車開過來，向着那堡壘射擊，一忽然倒在那小河和徐家匯河交叉口裏，最後另外有一輛小鋼炮向中國陣地直擊。我便看見幾個載了鋼盔的中國兵俯倒了後撤退。這時整個南市，火光融融，進攻的日軍，施放烟幕，彌漫了全區。最後大約在那小河相距一百碼的地點，正巧一陣烟幕後，我看見一排日軍在一條毀壞了的浮橋上爬過來，那中國軍隊便後退。

我們這時便回到中區去添軟片，在都城飯店裏，我跑到敦倫泰晤士報記者麥克唐納（Malcolm Mac Donald）房裏去邀他，麥克便跟着我跑，一邊抱怨着我打斷了他的午餐，我們又邀了卡爾生趕回去看千變萬化的『前線』。我們到法商電力公司正在我們方才的地點以東。我爬上了那公司裏的水塔上，正面對着徐家匯河。我看見在路傍停了一輛黃色汽車，我知道這是司帝芬的汽車，可是不看見司帝芬，也許他在這河邊的一幢房屋裏。

這水塔在徐家匯路一帶，算是最高的建築物。站在塔頂上，可以看到這戰事的鳥瞰。我們站在水塔的第二層月台上，正預備爬上最高的一層去的當兒，突然來了一陣槍彈直飛過來，當然是日軍的機關鎗彈。幸而有一堵鋼骨水泥的牆壁，把我們遮住了。可是在這水塔的上層，卻射滿了槍洞。這槍彈

聲愈來愈烈了，我們便爬下來到電力廠裏去躲一會兒。彈片把那廠房裏的玻璃天花板打碎倒下來。隔了十分鐘，槍聲暫停了，我們又出來了。這次沿着那鋼骨水泥的牆邊的木架走廊，便是水塔的最低一層，還可以防禦第二次的流彈，那裏我們可以望見徐家匯河的對岸，我們便繼續攝取照片。

我發現了我的脚下有一大堆紅色。

『看啊』，我對麥和卡二人說，『這是漆還是血？在幾分鐘之前我記得可並沒有看見什麼漆』。正當我們在猜疑是漆是血的時分，我們聽到外邊傳來了一片叫喊聲，我們便向牆外望去，看見許多中國軍隊越過了鐵絲網，進入法租界的徐家匯路上來，這時中國軍隊已經完全被日軍包圍了，假使再行向東撤退，必將被自南市黃浦灘來的日軍所迎頭痛擊，勢必全部犧牲。於是在徐家匯路上堆滿了來福槍、刺刀、手槍、手榴彈、槍彈、防毒面具和鋼盔，如果你能够拿到一些，便是挺好的紀念品。這些中國軍隊的年齡，看起來都非常輕，有許多簡直是像童子軍的年齡，那法國守軍立刻前來很和氣地對他們說，盛讚着他們的英雄壯烈的抗戰，並且保證他們不會移交日方。

這時卡爾生不見了。我便找尋他，結果看他爬上那水塔上面，我再攝取了幾幀照片後，便想跟他一起走，可是當我正要向上跨時，我碰見幾個驚慌失措的法國人走下來，于是我看見其中一個是受了傷，我便向後倒退了一步，望着那扶梯，又看見了一個濺滿了鮮血的受傷者跛行地跨下來。後面便來了卡爾生和另外幾個人拖了司帝芬下來，原來在我腳上踏着的鮮紅色的東西，並不是漆，而是司帝芬的血，他是死了。

『我看見一隻脚在那水塔頂上掛下來，』卡爾生告訴我，『我便趕上樓去看個究竟。當我到了塔頂，便看見司帝芬倒在血泊裏，還有一個受傷的和另外幾個外國人都嚇昏了，不知所措，都擰做一堆』。

司帝芬的頭部和褲襠裏給槍彈射穿，方才把我們嚇得躲進廠屋裏的一陣槍彈，正是擊中了這道牆

着水塔頂層的人們，這是多麼可憐呀，在離地一百英尺高的小月台上，簡直無從逃避，他們無可奈何，唯有逆順受。

這是十一月十一日，正巧近乎這次淞滬戰爭的最後一小時，司帝芬在休戰紀念日（譯者按十一月十一日本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還得戴上一朵鮮紅的花。

（4）戰魔的威力

我祇覺得我們的軍隊具有一種比上帝更偉大的威力——日本陸軍省大臣杉山元

這也許是戰略上的失策，中國在戰爭初期，便把她有限的實力和強戰死併；反過來，假使中國方面把自信力過強的敵人，在沒有增援之前，先行把他們誘進到上海以西的地帶後，可以集中力量，出奇兵攻襲之，那末，很可能打一仗『大勝仗』。

那些德國軍事顧問，確會勸中國當局用這種策略。他們預備把主力紮在蘇州至杭州一線，這樣可以使中國的實力和軍火的消耗，有相當代價，不致於浪費，同時又可以反攻和出奇制勝。

中國參謀當局，當然也有他們放棄這種策略的理由，可是至少一部份也是輕敵的心理所構成，有許多高級將領，的確想把住了一個陣地，對日本這樣的強敵，迎頭痛擊，立時三刻把他們趕回去，可是南京的淪陷，深深地搖動了他們的輕敵的心理，和速戰速決的勝利。

日軍截斷了中國右翼，便一路順風地直達南京，中國方面趕不及築起第二道堅強的陣地來，吸收上海方面的退軍；軍隊的運輸路線都被切斷，參謀工作無法進行，這許多統一性的軍隊，現在沖散了，一時無法得到司令部的命令，簡直等於迷了路。當時假使中國當局認清這新的局勢，放棄南京，立刻在北部和西部設防固守，那末，南京的犧牲，可不致這樣慘重。

破壞工作也沒有怎樣展開，雖則那射擊還沒有充份的時間來毀壞建築物，工廠和任何有利於日方

的軍事或經濟機構。這『焦土政策』被委員長參謀本部中最能幹的軍略家白崇禧將軍所擁護，可是像德國顧問的策略，一樣沒有被當局採取，最後在撤退之前，摧毀了交通部的大廈，這便是毀去的唯一的政府機關的建築物。日方把那兵工廠，各重要工廠、電力廠、鐵路、火車、碼頭、國立醫院，許多政府機關大廈，許多軍火，卡車和那南京軍官學校等一切重要機構，原封不動地都接收去，日本可以把這許多軍火給他們的傀儡組織的軍隊，配備起來，足足有餘，這樣一個富有的城市的戰利品，給他們搬運了三個月之久，還沒有搬清。

當南市淪陷的時候，這次戰爭雖則已經有了五個月之久，可是人民還沒有怎樣組織起來，即使在國都裏的人民也是沒有什麼組織，大約有五十多萬人撤退，可是沒有按照着政府的計劃實行。根本沒有什麼民眾組織存在，可以和軍隊連絡。當餓了好久的中國軍隊從遼遠的前線經過這城的時候，沒有什麼慰勞團體前來帶一些水和乾麵包來歡迎和安慰他們，然而中國軍隊卻依舊守着他們的紀律，難得會有一個兵士在沿路的商店裏去擷取一個大餅或油條充飢，或其他怎麼小的東西，他們把這些東西，全留給日軍做戰利品。因為一時沒有組織，對於這些人民，中國政府便採取了幾個西人的提議，劃出一個所謂『國際安全區』來收容這城裏的難民。

日軍在十二月十二日進佔南京，當時中國軍民還想從僅存的一個城門竄出去向揚子江北岸撤退。這時的情形萬分紊亂。有幾百個人民被日機用機關槍掃射，有許多搶着渡河而溺死；有許多被日軍在下關口捉住，於是屍首堆在那兒有四尺高。留在城內的人民唯有等候日軍佔領和『恢復秩序』。是怎樣的一種的命運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這次日軍在南京屠殺和醜行的事實，現在已經是全世界聞名了。據那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是由一個佩了希特勒的最高勳章的德國商人叫萊勃（Mr. John H. D. Rebe）的所主持——的一員給我的——一個統計，稱日軍單單在南京屠殺了四萬三千多人民，而且大多數是婦孺。日軍自從上海到南京

一路上所屠殺的無辜人民，大約有三十萬之多。這數目正巧和中國軍隊的大概傷亡人數相符合。

女子自十歲起至七十歲止，都會被姦污，喝醉了酒的日軍，時常會把不喜歡的用刺刀送回老家的去，有時做母親的眼看着她自己的孩子們被殺，而自己任其姦污。有一次一個日軍正要姦污一個女子的當兒，她身邊的嬰孩大哭起來，那日軍便把一條棉被覆上去，把那嬰孩立刻悶死，於是才太平地毀滅他的獸性。有許多日軍長官領導了下來來擄掠，踏進闔房，每晚總得抓個新的俘虜來洩慾，白晝露天宣淫，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了。在城內大約有五萬日軍，放縱了一個多月之久，大施姦污、屠殺、擄掠，和一切傷風敗俗的行爲，在現代世界中沒有比他們更下流的了。

有一萬二千家店舖和住宅中的一切貨物和傢具被擄掠一空後，付之一炬，連屋燒毀。市民們損失了不少東西，日軍兵士和軍官們把利人的汽車包車和其他車輛，用來把他們擄來的戰利品，搬運到上海去。日軍時常光臨到外國領事館裏，館裏的僱僕們都遭暗殺。人們唯有逆來順受。日軍官長們有時也參加這種不法行爲，有時替他們的下屬們辯護，他們的論調是，中國人是被征服的人民，絕對沒有權利來拘束日軍。這可又要想起日本陸軍大臣的一句話：「我們的軍隊具有一種比上帝更偉大的威力」。事實是這樣的，司令們自己大施擄掠，當然也得准許小兵們有同樣權益，日本大使館裏的官員們，看了這種情形，大吃一驚，可是他們也是無能為力，他們簡直連向日軍部借一輛汽車也不能夠，結果還得向那國際委員會去商借。

有一個外國觀察家稱述「在南京城裏，事實上幾乎每一家都遭到日軍們繼續不斷的擄掠，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大使或領事們的府第，和許多外國人的產業。各種車輛、食品、衣料、床褥、金錢、鐘表、地毯、圖畫，和其他有價值的東西等，都是他們搶劫的目標，大多數的店家，先是被小兵們另碎偷搶了些之後，便是有大隊日軍卡車前來，有計劃地在官長們直接指使下擄掠大宗貨物」。

在那國際「安全區」裏擠滿了二十五萬一日數驚的難民，這名謂安全區，實際確變成了無辜的人

民的危險區，這簡直把組織者初旨顛倒了；當初滿以為日方會尊重這安全區，同時也會敬了外國人的意見，日方司令部從沒有正式承認這個神聖地區，可是許多中國人暫住在那裏，深信在美國旗、英國旗和瑞士旗庇護之下，可以安全無虞，在事實上日軍把它當作一個方便的集中營看，日軍在這區裏可以任意攫去了不少男女，把他們殘酷地處死。

日軍一天天進這安全區來攫婦女們去撫慰他們這輩魯莽英雄。在英美教會學校里的女學生們，給他們抓去到日軍妓院裏後便音訊全無。有一次一個教會裏的人，在這安全區裏寫一封信給我，述及一件奇特的愛國行爲。這是關於一羣職業妓女營救了不少貞潔的女同胞的故事。一天因爲日軍光臨這個集中營，於是教會裏的女管事們，便向她們這輩職業妓女提議，她們如果能够挺身自願跟日軍去，那末，可以省了日軍去抓其他非職業化的婦女們，這輩妓女們正和其他婦女一樣痛恨敵人，可是她們慎重地考慮之後，幾乎全數挺身向前，當然她們的真操是不必說，她們有許多便這樣送了命，可是據我所能知道的直至現在爲止，她們沒有得到什麼死後的哀榮，或追悼紀念。

有成千成萬的男子，給日軍領出安全區，表面上稱是叫他們去參加工兵營工作，而實際給他們排齊了用機關槍掃射。有時把中國人當作演習刺刀肉搏戰的目標。當這輩勝利者把這種玩意玩厭了的時侯，會把汽油倒在中國人的頭上，把他們活活燒死。有時叫他們站在壕溝裏當作中國兵，日軍長官便領導了士兵來攻擊這種「敵方陣地」，便把這種手無寸鐵的徒手防禦者，任意亂刺。在教會醫院裏常常會有可怕的受傷者光臨，有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給火燒了，或則頭頸割去了一半，可是依舊是半死地活着。

美國人的產業全都是醫院、學校和教堂之類，是不斷地被日軍蹂躪搶劫。美國人時常會受到威脅，羞辱和打擊。因了他們收容了無家可歸的難民們——他們的家是被這些勝利者燒了。美國領事亞立奎 (John Allison) 能說流利的日語，卻也被一個日本軍官毫無理由地吃了一下耳光。同時在揚子

江近南京向西幾里，日機用機關槍掃射，並且炸沉了美艦「潘南號」，又攻毀了另外二艘，在甲板上明顯地落着極大的美國旗的美船，船上的人，死傷了不少。在華中和華北到處有許多的抗議書，關於美國產業和利益的摧毀，和美國人士的受辱等情，堆積起來準備提向國務院（即美國外交部）代為交涉；可是當時美國人還繼續把各種軍火賣給日本，獲取好利潤。

把這次軍事摧毀的損失，和這次日軍在南京的持久的「慶祝勝利」的損失相對照一下，卻非常有趣，據國際救濟委員會估計這次建築物不動產等的總損失，大約值中國法幣二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之巨，其中百分之一是損毀於軍事的，而其餘百分之九十九係損毀於日軍佔領後擄掠和焚燒，有價值一萬萬四千三百萬元的動產，（當然被沒收的政府機關的動產不計在內，）是日軍劫了去。

在日軍所經過的鄉村區，也遭到了同樣的損失。據這個國際委員會在一九三八年年初，僅僅對於南京週圍包括四個半縣份大約有一百另八萬人口的鄉區的損失的估計，也非常可觀，房屋，禽畜工具和米穀的總損失，達四千一百萬元。五分之二村屋被火燒了，十二萬三千頭水牛、黃牛和驢子被屠殺了或是偷去了，六十六萬一千件農具被毀壞，成千成萬把的鋤耙和水輪被折斷了燒去，其餘的銅鐵部份，收拾起來當作廢銅爛鐵，裝運到日本去製造槍炮。據救濟工作人員挨戶調查所得的一部份的報告，宣稱，在那裏有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九個農夫和四千三百八十個婦女，被日軍槍殺了，死亡的婦女百分之八十三是在四十五歲以上。如果這種數字是相當準確的，那末推而廣之，日軍在其他幾百個縣份裏所作的惡，也可想而知的龐大了。這巡視工作僅僅祇有一百天，把四個半縣份的情形，研究了個大概。

在日本統制下的報章，常常到處向日軍獻媚，宣傳日軍是被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者和恩人等滑稽文字，有的還刊印着日兵給中國孩子吃糖果的圖畫；可是日軍壓不了全世界的耳目，更不能瞞過他們在華的僑民。在上海有幾個日本人，深深地感到日軍這種污行，是一種奇恥大辱。我記得，例如，有

一次晚上和一位日本朋友閒談，他是一個具有自由思想的記者，他有着他自己的立場，他的名字，我不便宣佈，因為要保持他的安全問題。

『是的，這一切完全是事實』，他這樣出乎意料之外，直截了當地回答我，當我詢問他關於日軍的暴行的時候，『不過事實上比這些見聞更厲害』。他眼角裏已經給淚水潤溼了，我認爲這完全是出乎天性。

可是當東京號外正高喊宣稱着『戰事結束』的時候，頭腦比較清醒的日本人，卻開始認識擄掠南京之後，戰事必將無限地延長下去了。日本也許可以利用他們這種在揚子江下游的殺人放火的盜賊們來博得軍事上的勝利，可是不能得到政治上的勝利。日本起先滿以爲中國內部會及早分裂的，可是現在給他們這種慘酷的侵略戰，反而使他們團結起來了。他們這種暴行，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們最初和日本共存的幻想打破了。最重要的，對於他們這輩人集中在這一區裏的政治和經濟勢力統制了這全國政治權，而日本竭力需要他們的協助來促使中央媾和。

這兒便顯示了日本的政治手段的不高明，這是我們以後還可以看到的，同時也造成了她對於征服地區的策略的主要弱點。

當日軍把南京攻陷之後無法展開談判之門的時候，他們唯有把戰線一再擴大，擴大到全中國，他們開戰的初旨，是想協助獲取華北的『殖民地戰爭』，而現在却擴大到爭霸大陸的生死博鬥了。依着軍部最初計劃的殖民地戰爭，爭取華北和內蒙古，預備做將來攻襲蘇俄的根據地。而依着海軍的『南進政策』和歐洲人在遠東的權益起衝突，而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是大約有幾星期，日軍在南京的確認爲他們的話『粉碎了中國的抗戰實力』是不錯了。所以舉行了幾星期之久的『戰事結束』的慶祝大會。而當時如果日軍不慶祝而立刻繼續追襲撤退的中國軍隊，那末也是中國的致命傷。就在這短短幾星期中，中國又把她的軍重整起來，在西部另外築起了新

防錢。就在內地的新根據地展開了軍事訓練和入役的步序。

在五個月之後，中國士氣大振，戰略也大有進步了，中國已經能够博得第一次大勝利，著名的台兒莊之役——這可把日本所謂無敵的紀錄打破了。

第三章 日本的反共

(1) 殺人的教育

日本唯一的路線
便是向天堂邁進

——平沼

亞諾(Thurman Arnold)說誰也忍受不住在日常生活裏滲入了一百種的殘暴行爲，任何民族在戰爭中也許會回到原始的野蠻時代去，可是在現代世界上誰也不能否認找不出像日本軍隊這樣十分有系統和典型性的逐步降低和退化。當他認爲日本在和平社會裏的殘暴成分，不亞于戰爭時期。野獸到了飢餓或受人侵襲時，才會獸性勃發而殺人；牠們很明顯地嚐到了一肢一節便愉快。可是人類對於這種貪慾，必須加以限制和教化，像日本皇軍這種暴行的表現，正可以看作爲他們的現社會，把牠們教化出來的反射。

把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族的嬰孩去留在吃人肉的種族裏，即使他不被人家吃掉，他長大起來，便會吃人家。反過來講，把一個喜吃人肉的種族的孩子，好好地教化，他也會高興地和蕭伯納一樣歡喜吃胡蘿蔔。我曾經在南洋巴里一座荷國房子裏遇到一位很可敬的人物，他是伯遜(Burton)總本來是一個喜吃人肉種的嬰孩，從森林裏給人抱出來的，現在鼻子裏掛着一個大環，可是他會說流俐的荷蘭話，馬來話，法國話和英國話，他是這座房子裏的能幹的經理，而且歡喜吃蔬菜。在呂宋島的北部荒野地帶，我碰見一個依可樂(Igorot)醫生，他在童年時代被捉到美國去展覽標題着鮑諾來的一野人。後來一個傳教士把他救了出來，並且教化他，至今他的父親是依可樂種族裏會長，他的部下赤裸的青年們，依舊還在收集頭顱骨。但是這個醫生說，他願意把一個僵硬長頸的青年治愈，而不願意把他任意殺戮。

使日軍在西人眼光中所眩迷的唯一原因，便是因爲在日本這樣的醫生和酋長同時存在，因爲在種族上日本是和依可樂種有連系的。但是依可樂族可沒有轟炸機。日本軍部保持着酋長時代的遺傳性。

同時又主持着現代醫學和科學戰爭。這也是一切日本社會實況；他們的手，在現代化的機器上工作，而他們的頭腦，還是裝滿着迷信、偶像、戒條、武力和一切封建思想，而站在這三個世界中的開端，一天天削弱，當這座山巒倒下來的時候，日本最嚴重性的地震，也便爆發了。

有許多人以為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消滅了封建制度。事實上祇有取消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某種封建制度，同時保留了其餘的封建實力來發展日本的獨霸資本主義和軍閥主義。這並不是真正的革命，祇是革命的先聲。這個神權國家，確曾改組，把這種族的實權移到海軍和陸軍掌握之中，並且維護了貴族們和財閥們來統制了全國新的生產和經濟。

有許多封建和迷信制度維持着，而且有許多消滅了的又復活起來，它們這樣不相稱地和染了舶來的風尚，具着科學頭腦的人並存着。現在日本民衆所受的教育，認為天皇是至高無上的天神，同時天皇可以有許多天神將來指使千百萬人民去殺人來證明他的神權。所以警察、陸軍、海軍和一切天皇的代理人，無論是死了或是活着，一概須維持着尊嚴和威武。這天皇的聖旨是絕對不錯的。

日本的平民被灌輸着一種教育，使他們認為這是有意味的，因為是天皇的人民，所以他本身也是天神之一，等于耶穌、莫罕默德、達爾文、紐頓、愛因斯坦（*Einstein*）或羅斯福總統所生的。至少他個人在家庭裏是被他的妻子和最下級的奴民（在日本社會階級中之一，他的主人可以把他的商品化地自由賣買。）所尊敬，所以也可以算天神。再進一步，假使他爲了天皇而死，他便算做一個國家英雄天將，便可以列入神廟裏和其他的天神天將同享神祀。在一個孩子剛開始認字的時候，便把這種觀念灌輸了進去，這樣的教育，便養成了現在的日兵，正像伯遜族裏得到了一名頭等的吃人肉的勇士，是用吃人的教育所教導出來的，或則像納粹黨得到了「純亞利人」一般。

日軍的精神訓育，是根據了武士道的封建規條，這種規條，是教人必須絕對忠心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同時也要有俠義風度。可是這種鋤強扶弱的俠義風度，日軍却沒有做到，他們架起了機關槍時，

可不知道什麼叫鋤強扶弱和自由平等。今日所存在的武士道、不過是一種瘋狂的殺人之道而已。不滿一百年以前，這輩武士可以他所碰到的第一個不幸的平民來試劍，格殺不論。他祇有當他第一下打不倒他的對方時，便認爲奇恥大辱，所以不難看到日軍在中國這種暴行，也便是這種武士道的遺傳性。還有其他的暴行也同樣被煢揚着。例如學校裏把日本侵略朝鮮的史蹟來教導學生們，認爲這是皇軍的無敵精神的表現。在朝鮮的凱旋回國的日軍班師回朝的時候，帶了三萬只腌漬的耳朵和鼻子。這樣把人體肢解的殘行的可怖，在他們心目中認爲是懦弱，而青年人都搶着要這樣示威來表示出他們的勇敢。在一九二三年地震的那年，在日本由軍警當局領導處決六千名高麗人，其中有幾個劊子手，是由婦女和十幾歲的小孩來執行，這種死刑和酷刑，他們認爲這是光榮的事。

美國駐華大使約翰生 (Nelson Johnson) 有一次對我說起，他所覺得驚奇的，並不是那些暴行，因爲那是司空見慣了的；但是他發現日本軍人可以行使或助長這種暴行而不受法律處分的習慣，解答是這樣的，因爲這種橫暴的本身，便是軍律的一部份。日本軍官對於統率一枝新近入伍的士兵，是非常不滿意，他不得不教這些生手『實試』暴行。直至他認爲够兇暴了才可以。在一二八之役，在上海有許多新聞記者稱，在江灣跑馬廳裏有幾個日本軍官把一批俘虜到的中國老百姓，其中也有婦女和孩子，用繩連繫起來，便命令他部下新來的隊伍，施行刺刀沖鋒肉搏演習，把這批中國人當做標的。當一個兵刺得不妥當時，他必須再來一下，他能刺準直至他能克制他自己的胆怯時方止。在這次八一三也有許多外國人親眼目睹這種演習。

擄掠婦女的行爲，像上述的情形同樣地被鼓勵着。在日本婦女是動產，有幾百萬的婦女在市場上出售她們的身價，用體重比起來，簡直還不如牛肉。把童貞的日本女子賣給地主或富商，算是一種合法的行爲。容忍是一種日本的美德，可是對於通姦却不足爲羞的。可是這也就是給貧困的農夫一個經濟上的保障。

日本軍時常鼓勵農家的孩子，把戰爭認爲是表示他的勇氣和大丈夫氣概的機會。可憐的日本女子，必須犧牲她們的真操來應付這羣男子的需要。這樣對於中國人將作何感想呢？事實上，日本認爲這是極大的光榮。在日本女子也是一種貨物，她們的被賣出和銷售也是日本的大企業之一。在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部在東亞開始建造一所樂園。據日本政府官方的統計宣稱，日本醫院裏平均每天有領有營業執照的妓女一百另二萬三千九百十四人來就醫；但日軍在本國沒有心思去改正他們這種暴行。他們忙着向世界推進，首先向東北三省的張學良氏與師問罪。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農民的貧困，愈形嚴重了，在東京一區有執照的娼妓稱客的人數已有五千六百三十名，真是空前的高紀錄。

日本不費分文搶劫了中國的商品和工業，他們以爲什麼女人要算例外呢？他們認爲姦污和搶劫，女人便是戰利品，當他們認爲需要當作一種資產來重建這種日本專業獲取厚利。

對於日本這種品性和這整個特殊營業，有另一個更深奧的理由，這便是這種民族永久忍受着的下劣的錯綜複雜性。有一部份具有真實的歷史性的理由，正和德國納粹黨的錯綜複雜性相類似。但是這跟日本人又潛意识地他們這種不幸的意識上和體格上的劣根性，灌輸給高麗人和中國人，使他們也服從他們的天皇。他們時常找人出氣。所以日軍時常以爲把刺刀對準了一個高大的中國農民，勸令他跪下來，或則把一個英國人的襯袴剝下來，以爲得意的事，在本國日本人等于是在恐懼世界裏，他們恐懼他們的警察和他們的上師們。在中國，他們也在恐懼着他們的官長。他們的暴行是暫時的，藉以自慰的表示，同時又可以抵消他們的恐懼心理。

最後，日本人在生理上，說起來是非常神經過敏的。自從明治時代以來，他們是在高壓氣氛下度日子，因爲日本社會的遺毒生長起來，一天厲害一天。封建勢力潛伏在工業社會裏，侵蝕了智力和體力上的自由，我們祇要把日本人在中國的行爲，和在本國時的表面溫善、美麗、鎮靜和彬彬有禮的情形相對照一下，便可以明白他們在生理上的壓迫，是多麼深刻了。這種壓迫的程度，自從一九三七年

後，格外廣泛和深刻了。現在普通的中層階段的日本人，滿腹都被抑止了的感情。假如沒有什麼集團做後盾的話，沒有一個日本人敢把這種重負推翻，否則便會成爲驚奇的事。

日本人暴動確是可怕，我有一次在上海在街路上，看見日本人無故向婦女尋釁，用腳向她們的腹部猛踢。大陸報記者勞旭（Malcolm Ross）告訴我，他在虹口親眼看見的一件事。有一羣日本人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裏想把一個和他們喧罵的人抓出來。勞旭望見一個英國巡警挺身出來想維護那個人。驟然使他措手不及，有一個日本人在他背後跳起三尺高，撲到他的背上，把他的頸部猛烈地咬住了，而其餘的幾個日本人却拍手大笑。

除去了正常的約束，再除去了個人的責任心；加上了從農村裏抽來的徵兵的絕對愚魯（因爲他們所知道的，都是業經軍部批准了的消息），再加上了把野蠻認作光榮的意識，你便可以看到在中國的日禍。假使把這種同樣的教育和意識，灌輸到了西方人民的腦袋的話，那末，你準會看到美禍或法禍。但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並非不知道那高壓下的情感，也許會爆發起來，把他們推翻的一天。當日本這種極度恐懼的心理崩潰時，全世界便可以看到日本史上最慘酷和最野蠻的一頁內戰史。一個日本軍官對於他的部下當他一旦失却了「權威」的時候，他唯一切腹自殺。日本的陸軍和海軍一旦吃了大敗仗，把他們的無敵夢打碎了時，他們必須和將領們以及全體神霄，實行切腹禮。（譯者按所以這次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後便有許多大臣和不知多少的無名小卒，都切腹自殺，而東條首相，也想行切腹禮，後因措手不及而改用手槍，結果被美國佔領軍救活轉來候審。）

我曾經把這個問題向幾個日本激烈派，革命派和一二個具自由思想的貴族詢問，他們都說這是事實。

（2）怎樣可以親善？

日本一再向世界宣稱她這次在中國戰爭的目的，便是要建立中日親善關係。有時日本人親口對我

日本堅決地要根

本剷除在蔣介石

政權幕後的共產

勢力——日本近

衛首相

這樣說的，口氣非常誠摯。日本人這種自欺自的和顛倒是非的愚昧的信念，便是了解一切邏輯。

我記得有一次和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雅納爾海軍大將 (Admiral H. B. Yarnell) 談話，他和善地帶着一些譏笑的模樣，談起了日本人的古怪頭腦。他說：他在前一二天拜訪日軍華南派遣軍總司令松井大將。

「松井似乎是一位溫善的老人」，他說：「我問他有什麼嗜好？因為我知道他是下野的名單裏東山再起的一位，所以我想他在野的時候，也許喜歡題詩，作畫，賞菊，養鴿，你可知道他怎樣回答我？他直立起來擰足五尺高度，張大了瞳孔說：『我幾年來唯一的嗜好，便是促使和增進中日親善』」。

日本抱着一種熱誠的四海之內皆弟兄的精神，到中國來擄掠和屠殺。我在以上所述及的幾件日本暴行，僅僅是極小的例子，和在日本佔領區內千百萬人民所忍受到的苦楚，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像松井這種荒乎其唐的言詞，祇有站在上海中區摩天大樓頂層的一個小房間裏，才足以聽聽，可是我的辦公室也在那裏。

在那裏我可以向南向北瞭望，向東越過黃浦江，望見浦東每一個方向，可以看見這個亞洲最大商埠的戰後的輪廓。虹口、閘北、江灣、吳淞、南市、浦東、和其他區域，在那裏在幾個月之前有二百多萬人民居住和工作，現在變成了瓦礫場。唯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一部份。（譯者按現在租界已經取消了。）完整如故。在這一點微小的西人統治的沃地的週圍，全變成了一片荒涼的人造沙漠。

據正確的眼光看起來，日本在揚子江下游一帶的摧毀，等於傳統的長航程的海盜行爲的結果。在過去，日本海盜曾經好多次在中國沿海商埠登陸擄掠，可是他們這種海盜行爲，是有組織的大事業，也是有史以來空前的最有系統的大規模的海盜侵襲。着了這侵略者所擾的地區的一切，稱他們做海

盜，是再妥當也沒有了。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因為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所造成的荒涼和痛苦，並沒有成效，祇是退化而已。

有許多歐洲的帝國主義們，向着世界的不進化地區像非洲推進，務必帶些新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學識等前去，使他們進化，把當地的土人教化起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可沒有這樣。她有些像西班牙帝國主義，可是西班牙也時常帶些新文化來，總比她所摧毀的較多一點兒。日本所要拓殖的並不是半開化的人民的國家，而是一個比她自己更勝一等的國家。所以她的軍隊，自己不能再開拓新的邊界，唯有暫時把原有的保持。

回溯到中古時代的情形，和封建制度的遺毒，日本實在比中國要黑暗得多。那時日本的武士，代表某種社會力量，他們的頭腦，比他們所要篡奪的要退步得多，他們是絕對野蠻，所以要達到他們的任務，所謂『中日親善』，唯有把中國的文化完全消滅才是。他們務必毀滅中國前進的原動力。否則讓中國向着經濟、政治、和一切社會運動進展，並且獨立，共存的話，他們非但不可能征服中國，而連日本本身的半封建性的統治階級，也會被消滅。

根本上，日本軍閥們帶到中國來沒有什麼東西，唯有退化——麻醉、奴化、自私和死亡。他們帶來的的是資本嗎？日本本國已經相當缺乏資金，她不能投什麼資，唯有從大陸上擄掠些資金和人力回去。是原料嗎？她自己是先天不足的，所以無從出口。是製成品嗎？日本所能製造的，中國也早已能够製造了。對於科學和技術方面，日本除了也從西洋學來的以外，可沒有多大的特長，而中國卻儘可以直接吸取，這種學術，可不必日本轉交，是文化嗎？日本在各方面是完全摹仿着中國和西洋，所以他們這輩激進的天神將們，可實在是沒有他們用武之理。

有二點注目的意旨，統制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是必須摧毀大陸上的抗戰實力，還有那日本統治階級們要統制中國的資源和人力的企圖。祇要當這種成見完全被瞭解當作是親善的舉動的時候，可就

滿足了。

日本的擄掠程序，可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便是搶劫財物和從戰場上得到的真正的戰利品，有些被小兵們拿去。金錢、五金、卡車、糧食、政府財產、私產、和貨物等東西，都是這輩強盜們所染指的。在戰爭移西了好久之後，日本人還是忙着把他們這些第一階段的戰利品搬運出上海。中國的住宅、店家、棧房和廠家裏的財產、貨物、生財和原料都遭洗劫一空。

上海的一切，完全是給日本所擄掠的目標。它是中國的工業、金融業、航行業、和商業的中心。中國四分之三的工業，全築在上海和近郊，百分之六十的進出口貿易，在黃浦江中進出，有三百五十萬人口住在這區域裏。那三個月的炮射和轟炸，對於這裏的損失，已經非常慘重了。可是周密的洗劫，便進一步實施了。

第二個階段，便是日本宣傳家所稱的「復興」，這可比第一個階段更澈底。這並不是再來一次擄掠，而是一個有系統的持久性的擄掠制度。工廠完全被日軍接收，而出品全用「中日經濟合作」的標貼。富有的中國商人們，趕不及逃到租界裏去的，立刻被日方找住他們的財產，便簡接地被沒收，或則立刻失竊。最後，在日本勢力圈內的中上階級的中國人，大都是受過相當教育的，除了幾個傀儡和漢奸之外，都被壓迫到赤貧的地步。

中國的資源——人力、機器、工具、自然產業、原料、和公用事業——變成日本的。在軍隊做前導之下，日本帝國主義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公司，像在滿洲，有一個可驚的數目的企業，專利事業和買賣，包括把持一切工業和征收農田，和一切麻醉業，淫業賭業，和夜市的稅收，他們這種制度，是把強盜行為掩飾成爲高貴的治理組織。他們的算盤，非常精明。會把人民的最後的一個小錢，都搾了出來。

這計劃的目標是很簡單，日唯一的目的，是把全中國征服，勒索，務使中國單單爲她的帝國服

務。日本盼望這樣，才可以使中日親善之花盛開。可是他們手段是用炸彈和欺詐來灌溉這朵親善之花。

日軍的摧毀和攫取中國的工業根據地，和獨霸沿海的商業和經濟的行爲，是有三點策略：第一點，是純全的軍事，使敵方的經濟，尤其是手工業方面的一切不准移動，因爲他們認爲這是戰勝後「合法的」戰利品。第二把持一切被征服者的代價，這戰爭對於被征服者並不是僅僅賠償一些損失而已，並且要繼續不斷地需索。第三是政治方面的，保證日軍是中國政府的太上組織，（譯者按：日本這個夢想，非但沒有實現，現在他本國卻反而給美軍佔據了，所以駐日美軍總部，卻可以稱之爲名符其實的日本政府的太上組織，而麥克沃塞元帥，卻可以算太上皇了。）非但要專制統治全中國的人民，而且把中國當作他們軍部的大陸根據地，伸展他們的軍國專制權到日本本國去，同時要把白種人全部逐出，清除亞洲。

這種策略是矛盾的，過了二年日本會承認這確是矛盾。他們是被戰線的長短和時間的久暫問題所限制。其中有一點，他們是沒有計及。你不可不能使一個人絕對服從，當你沒有把他的購買力摧毀之前。你不可不能使對方全部人民甘心來賠償你爲了侵襲他們所受的損失，當對方大部的人還持有着武器和抗戰的意志。那輩松井，土肥原和板垣等人物，還得要去研究研究在德國教科書中還沒有刊出的和全面戰爭有關的學識，像關于，金融，理財，信用，貿易和生產和消費間的微妙關係。我還得把更進一步的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放在後面再討論。

但是日本一再在全地球四分之一的人民身上施手段使他們受損失，痛苦和死亡。可是中國人一點也沒覺畏懼，即使外國商人們和列強也受到重大的損失。在滿洲和華北日軍幾年來的行跡已經够使人警惕了。但是有許多久居在中國洋商們還是迷惑不解他們目前對於他們前輩和他們自己在這一世紀內在中國所建樹的利益可以保持。他們似乎從來也不會把過去和現在或將來的關係相探討一下。有幾位

腦袋裏的印象確實以爲日本人會幫助他們『把中國人措置不當』。同時，他們以爲日本軍官們真的要來『改善外國人在中國商業地位』。

當我遇到了許多歐洲商人和美國人，他們的頭腦裏的確有這種見解存在。當我和他們會談起來真會使我發生一種奇怪的感覺以爲我是留在一個盲目的世界裏。在幾個月之後，我到了漢口，我才覺得他們耶穌自有道理。有一天當在我一個午餐席面上，有一個朋友要求我把日軍佔領上海的經過和洋商權益的情形講給他聽。然則我怕講，可是爲了我自己的見解和理由便講了出來。

在未講之前先來了一個有趣的儀式。我記得每人先得講一則笑話。有一個人講一個醉漢在路上碰見了他一區裏的神父，那神父便責問他，『瓊司你可記得酒是你最大的敵人嗎？』瓊司便回答，『可是神父，你是不是常教我必須愛敵如友嗎？』接着便是鬨堂大笑。這使我覺得似乎很有些無獨有偶。當日軍每天轟炸城市死屍佈滿了各處可是我想這也許是一種疲乏的旁觀者的情緒鬆弛下來的辦法。

我把我所知道的日本計劃講出來，我說他們必須排出外來的勢力，他們想獨霸中國的資源和商業。我再把我七年以來從哈爾濱到上海所看到的日本經濟侵略的步序一層一節地講給他們聽。我講了不少數目字和例子後，這題目已經完全了。我講完了便向那位坐在我隔肩的主席問：『當日本佔領漢口之後，你料洋商的營業將要起怎樣變化？』

他是一個歐洲人，他在揚子江流域裏，做了廿多年專取儲金的掙客專業，他做得相當興旺，所經理的，是植物油和雞蛋一類的貨物。當然這類貨品，也是日本所注目的一種。但是在一九二七年時，漢口是共黨勢力圈，所以有『紅色漢口』之稱。他那時也在漢口，他痛恨共黨，而且把中國人都當作共產黨。他完全接受日本反共的見解，（在那時）；他以爲近衛公爵說『蔣介石是一個布爾薩維克主義的黨徒，是十分對的，他主張並且希望中國會恢復國民政府以前遜清時代在日本警察維護之下，外國商人才可以稱心如意地經營他們的事業。』

他這種回答，可使我驚奇起來，他簡直對於我所說的一分一毫，都不相信。『日本到了漢口之後，市面必大大地興旺起來』，他說，『也許一時對於中國人方面是很困難，但是這實在是對於他們是有好處的。當然對於洋商是特別有好處。日本人將開發這條河流，他們懂得商業，我們可以和他們交易。最好的一點，便是法律和秩序，必將重整起來。他們會把共黨一次掃清，可以一勞永逸了』。

◎ 這個傻子，簡直在做他的活夢。事實表示出來，日軍終於把上海到漢口的洋商貿易，實行完全封鎖起來。我相信這個傻子，依舊在漢口正在享受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呢。但是他可再也不能夠得到什麼雞蛋和植物油了。日本早已把這種貨品統制了。

在戰事爆發以來，我已經看到了不少像這般具着井底觀天頭腦的外國資本家和商人。有幾個的確很快地發了財，他們把汽油，鉛鋼鐵和其他原料供給這侵略者來完成他們摧毀外國權益的步驟。他們這種人當然是最末覺悟，要想抵制日本的人了。像很大的英商怡和洋行，在南京爲日本訂立了一張購軍用鐵路和建築材料的大合同，他們多麼懇懇地有力地爲日本効勞，來迎合日本的心理，不顧到事實上日軍正在一天天使他們航業陷于停頓，他們的權益也受了侵蝕，他們的癡心還是樂觀，我可真有些不願意承認像這輩大人先生們——時常會有些是例外的——不可能會種樣幹，老是只知利潤超出上月份的損益帳，或則把下個月的期望，估得太高。我對於他們這種判斷力或觀念，完全不信任。可是他們也許自有他們的道理，我們可不必苛責他們；他們是在井底裏觀天，當然各處都起了災，即使迫近了他們，還是不知不覺。

(3) 孤島「上海」

在民衆教育和政治組織方面沒有……進步在這次戰爭中這事實變得更加明顯了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宣言

日本搶到了上海和揚子江下流一帶後，把近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國「現代」工業摧毀。單單在上海一區，有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大小工廠，和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一個工場，被

日軍所毀壞或掠奪，（這數字是根據一九三九年重慶中國經濟部所發表的）。即使在廣州和漢口淪陷以前，日本已經剝奪了中國所有全部電氣工廠的百分之七十，又損壞了一半的重工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造紙業橡膠業和紡織業，被摧毀或掠奪，其中三百家絲織廠完全停頓起來，在上海五十四家綢廠之中，五十家落在日本手掌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中國的輕重機器工場被毀壞或沒收。

這是個很明顯的大錯，在戰前中國的工業，都無意識地集中在沿海和租界裏，或則鄰近租界，幾乎全部的官辦或則官商合辦的工業，建築在揚子江和黃浦江一帶往來的日艦短射程範圍之內。有許多兵工業，築在虹口和楊樹浦，這正是日本在租界裏的「防地」。在任何事件發生時，該區立刻便會佈滿了日本海軍陸戰隊，高級政府官員在上海工業上投了很大的資本，而他們的工廠，曾經在一二八之役給日本摧毀了，而又在當地重建起來，他們也許以為再也不會發生第二次的摧毀，同時在內地廣大的好地位，卻被遺忘了不去投資，在上海和其他訂約通商口岸裏，中國的買辦階級的資本和外國帝國主義者勾結起來，造成了殖民地式的經濟根據地，這便阻止了中國正常的工業發展，同時又便宜了日本，她可以把它當作一塊侵略大陸的踏脚板。

如果在戰前，工人能够組織起來，如果他們早已受到政治意識的訓練，準備動員的話，中國的工業可以保全，可以移向內地，工業技術人員們，也可以站在中國方面的工業戰線上，日本也不得不化了更大的代價來爭鬥。這輩工人，如果有組織地動員起來，有千萬噸重的機器，工具和五金可以在七七至上海淪陷之前的時期內移向內地去。在上海的大部份的中國工廠（其中能够大量生產的極少）裏的機器，相當輕而且工具也很簡便，利於搬運。這些機器和工具，在移向內地的持久戰爭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內地缺乏工業建設，所以這種機器，簡直是無價之寶。如果把水陸運輸工作人員都動員起來，如果把在揚子江下游一帶四千萬人口中的一小部份組織起來，那末有幾萬噸重的有價值的生財物資，可以安全地移到內地去。

近乎三分之二的日本在華投資的事業，集中在上海。而大多數的日本工廠，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楊樹浦區內，以及在閘北邊界的越界築路上。單單日本紗廠，僅有五萬多中國工人；事實上，日本工廠完全是由中國工人工作。如果把這許多工人組織起來，給他們武器，並且實行訓練破壞工作的話，那末，日本在這裏的工業根據地，可以在蘆溝橋事件至上海撤退四個月內全部消毀。當中國軍隊確實佔領虹口和楊樹浦時，大可以把日本工廠大部消毀。

但是事實上，當中國軍隊被迫退出這日本根據地和立腳點的虹口和楊樹浦時，日本工廠幾乎沒有什麼損失。在三十家日本大紗廠中，祇有二家被毀。祇有六家日本小廠家受損。所以在租界裏的敵方工業在戰時直接所受的損失也許簡直要比日本自己給英美在滬十萬萬元投資事業所蒙的損失還輕。

在上海我祇遇到一位頭腦非常清醒的政府官員，他便是宋子文先生，是蔣委員長的姻舅，中國銀行的主席。

「既然你們政府的整個經濟基礎築在上海週圍之內，當你們失去了上海根據地之後，你們將怎樣幹？」有一天我這樣問他。

「你想我會怎樣？」他回答着，「除了在內地另起爐灶重行建設新經濟基礎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我們將使我們的人民協力忍受和負但起來。我們可以這樣持久下去，沒有第二條路。你看，在江西的共產黨，他們祇有一省地盤，至今還沒有剿滅。這樣當中國整個國家動員起來時，你便可以看到怎樣的效果了。」

「啊，不錯，可是這麼說來有些激烈的變遷」，我說，「你想政府預備這樣幹嗎？」

「也許目前還沒有，但是最後看情形需要，自會儘量動員我們全部力量來抗戰」。他這樣回答。『這樣你們便可以保全不少工業機械和工具。這樣的動員律可以給政府極大的權力來徵集國家的工業和財源。假使這輩工業家們，不預備自動內移，政府爲什麼不實行強制接收他們的工廠，把人民

組織起來，搬運這些機械到內地去，重建工業。」

「這步序會做到的」，他同意着，「而且已經有一部實行，也許在這裏是太晚了，可是在其他各處還可以幹，我們必須有耐心」。

但是離開在中國宋先生是最清麗的財政第一流人才，可是他並沒有入閣在政府任要職。他有他自己的政治頭腦，可是並不常和蔣委員長長的政見相同。（譯者按：現在蔣宋完全合作，國際地位已升，由次殖民地地位，一躍而為世界五強之一）。

（4）上海的巡禮

除了要使中國民眾
的興旺之外日軍絕
對沒有其他企圖

——土匪原

有時我在一遍荒涼的上海四週漫步時，有些悚然之感，一里一里的過去，難得會看見一個烟囪或一枝電線木桿豎起着。這損傷的桿木繫着些另落的斷線。在瓦礫堆裏，時常會有屍首發現；一切都是靜寂得像冬眠一樣。

以前我對於閩北和虹口是還可以算相當熟悉，可是現在在我所認得的幾處，都已毀滅了。在這個火燒剩了劫後地獄裏的死灰色的路上走起來，準會使你失

迷了路途。可是有一個人似乎可以把每一片磚瓦，或摧毀了的機器認出來，他便是愛黎先生（Rowley Alley）。他是紐西蘭人，任上海工部局工務處巡長。我這次伴他巡視四週；這次對於上海有極大的認識。在這中間工業區的墓地上，即刻又看見摧毀了的工場又活動起來了。

我們看見日軍監視着用鐵練鎖着的可憐的中國俘虜們，拖着破屋和瓦礫中翻出來的廢鐵和機器，有許多工廠，損失頗巨，他們把廠內全部的機器生財搬了去，運往日本，在那裏日軍特務隊，便把這些東西賣給日本資本家。店家的貨物都被洗劫一空，即使最後一兩鐵片或則其他小東西，都被搜括了去。愛黎的住宅，是在江灣，也被擄掠得一些也不剩。

在閩北有許多廠還存在着，在虹口楊樹浦的中國工廠的損傷也不大，日本人以後便把它們改作

日本工廠，而有些竟把機件搗毀了當廢鐵，此後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全入于日軍掌握之中。

愛黎先生能够知道那些損壞了的機器的來歷，在他的短短的幾句話裏，把鐵認爲是有血有生命的東西一般。有時也會指出一塊鐵片，日軍還沒有搜括到的東西，幾乎形狀也辨不清的，而牠會把它的整個來歷講出來，便會有一個工廠，歷歷如在目前。

「那是張啓林的新的爐子，」他會指着一塊鐵片，肯定地說，「這是我在不久以前勸他購置的；那只舊的，是實在不中用了，我可不知道這可憐的東西，是否在那一堆瓦礫之下」？

我們走到一大堆混雜的磚石堆裏，看見一批壓壞了的生財傢具和破損的車輪或車床。「這是楊興的電料行」，愛黎會自告奮勇地說，「我在一二個月以前，叫他好好地監護他的機件。他守在那裏，直至他僱的二個工人失去了他們的手指，現在想起來，可不成問題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少，愛黎先生能够把幾百個小工廠的私人歷史，和幾個工人的歷史講出來，他比誰都熟悉，因爲他是公共租界工務處巡長，所以他們不能到租界以外去巡察，工部局把這一部門的工作，都交給他和海恩特（Hansor Hinder），他們確曾救了不少人。

愛黎先生能够了解不單單這工廠的幣值方面的估計，而且在工人的效率和生活情形，也很明瞭。他說有成千成萬的工作，依着這種待遇奇苛的這種工場活命，可是他們的飯碗，現在都給日本炸彈，付之一炬了。這些瓦礫場，也就是他十年來在亞洲工業努力協助的結局。

在我個人對於這種剝削工人的工場的行爲，也認爲太不人道了。在上海的日本工廠，大都僱女工做的。有許多工場，卻僱未成年的男孩子，訂成合同，與廠主服役幾年。

「有一男工場」，愛黎有一次在巡察時對我說，「場主是一個私生子，他從孤兒院裏買了六十四個孤兒來工作，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晚上睡在機器架上面，他們不准出去，這樣廠主，可以得百分之百的利潤，當我去檢查這羣孩子，看見其中有廿七個是手指不全的，共計有三十八隻手指，是被

機器軋去的。」

在這次戰爭中，有幾個孩子被他們的主人關在工廠裏，有許多死在裏面，有些被日本擄去做苦工，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發現一件趣事，在開北有一家工場的主人，把幾個學徒關在屋子裏看守，他每隔一天或二天，他去探訪一次，他的屋子沒有給砲火擊中，同時帶些糧食給他們吃，有一天這幾個孩子連絡起來，偷了鑰匙，把主人倒鎖在屋子裏，叫他自己去看守，這是一件僅有絕無的趣事。

「這樣把這些工場，一掃光了也好」，愛黎先生時常說，「如果取而代之的比老的好一些的話，但是事實上比這更不如，更兇，這些日本人所幹的，要比他們兇十倍，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奴隸生活怎樣情形」。

大多數的人都是這麼想，可是並不是個個這樣想，我記得有一個外國人時常受過中國工人的工潮的威脅，所以他說，這樣也許可以使中國人「安份一些」了。他相信這樣可以使工資便宜了，事實上不錯，便宜了，——給日本人便宜了。

在上海這次戰爭有八十萬工人失了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裏擠滿了二百萬中國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變了赤貧，在這次上海戰爭，最後階段時，有成千成萬的男女老少被關在法租界和南市交界的大鐵門外，叫喧呼喊，饑神父便在南市組織一個所謂「安全區」。便有三十萬人擁擠在這一個簡單組織裏。

我和愛黎先生在法租界邊界鐵門口，看見由安南兵和法國兵防守着，在鐵門外是一羣可憐的人們，整天在籲求着開放鐵門，同時哀求着麵包和水，現在有一個中國救濟組織得到了法當局的准許，到鐵門邊把大餅油條和麵包之類，從鐵柵欄中擲過去，另外有許多中國童子軍（他們在戰爭期內幹了不少壯烈的救護工作，有許多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們帶了幾桶水來給他們解渴。在他們的後面望去烟火彌漫。這一羣可憐的難民，形容憔悴，面孔給烟燻黑了，有些頭部用紗布包着。有些跛了腳。這

情形看起來，有些像法國巴黎的六月革命，所不同的，是這兒沒有革命的性質。這裏都是些手無寸鐵的，無組織的恐懼的，被逐在籠裏想逃出樊籠去向隣近（法租界）求救。

大約有幾個月之久，你在路上可以看見滿目悽慘的景色，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難民收容所，全數祇能收容十萬人，所有五六十萬以上的難民，宿在露天和人行道上，他們在人家和店家的門口，或樹竇邊，或弄堂角裏睡下來，用他們唯一的財產隨身包袱做枕墊，警務當局把他們這輩「流浪者」驅集在大路上，在那兒，他們尤其在晚上可以擠在電炬光耀的柵窗邊取暖。在每一條里弄裏難民們蹲着，站着，有的隨地躺着。

我的報紙要我寫些關於上海住的問題，我便實行實地採訪，在每一所房屋裏每一層和每一間都住滿了，人們日夜輪值睡眠，每層都搭滿了攔樓，你要上樓去，總得要側了身體在人羣裏穿上去，在每一個灘台上，雖則晚上寒風蝕骨。也有人租住下來，在一所普通三四層樓的房子，本來祇可住四五十人的，現在卻擠滿了四五百人。

在幾星期以來，難民收容所裏的死亡率，每天平均在二百人以上，有一個救世軍所辦的大收容所裏，收容一萬七千人，擠滿在一個停了課的學校裏，在一天之中，我看見有六十個死屍抬出來，大多是婦孺，這些救世軍，也盡他們的能力來救護他們，在那兒也有臨時的產婦室，其他各處貧困的母親們，在走廊裏或弄堂裏生產，有時在人行道上生產，有時候由她們鄰居讓出了一角，（難民舖位）給她們生產，而他們自己犧牲一二晚不睡。

有許多教會人士對於救濟工作，是非常熱心；可是我碰到有許多外國人對於這輩難民是漠不關心，他們坐在汽車裏在靜安寺路、霞飛路、和海格路上來往，上寫字間辦公，或公司買東西，他們在路上，所見到的是在他們前面的車輛，在他們的意見說來，這件事「完全是虛構」。我聽到幾位在都城飯店或總會裏舒適的晚宴席上發表意見，認為這些難民收容所實在是一樁壞事情。「他們這班難民

們會養成了一種貪吃懶做的壞習慣」，他們說，「他們再也不想去工作了，這簡直是胡鬧」。

可是很奇怪，他們這種人對於失迷了的一隻狗或一隻貓，卻非常關心。在這個天堂和地獄集成上海的幾個西報館裏的編輯室裏，時常接到他們的外國讀者來的不切實際的信札，有一次爲了爭辯怎樣飼養金魚的問題，在報上爭戰了好幾天，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讀者寫來了一封非常生動的信，大意是向大眾籲求着把廚房裏剩下來的美食，收集在鐵罐裏去給可憐的餓狗吃，另外有一位老上海西人，他因爲坐在汽車裏駛過法租界，看見了一隻沒有主人的狗流浪着，他想那隻狗，一定沒有吃，沒有喝，竟使他一整夜睡不着，但是他們可不知道這種狗，早已在距離不遠的戰壕裏吃得很肥了，而同時不知道那些可憐的流浪孩子們餓得半死的慘狀，他們沒有吃，沒有住，也沒有父母。

我對於這種情形，不想作什麼了解；我單單把事實報告出來。

同時上海的夜生活，又活躍起來了，在蘇州河之南。華貴的旅舍、飯店，咖啡館和妓院的營業，非常興旺，在兩租界裏的舞場門口，排滿了汽車，他們一元四跳的營業，鼎盛非凡，許多頭髮光亮服裝畢挺的高等中國人，在舞池裏非常得意地跨着孤步舞。我敢肯定地說，他們這輩之中，有許多是在租界裏的工廠老闆和房東，這種黑心的房東，把房租加倍提高，把可憐的難民們逐出他們的大堆棧，使他們在露天過流浪生活等……情形。有愛國份子，做了一篇告示，並且在這種燈紅酒綠場所裏擲了一顆炸彈，想把他們送進地獄裏去，這輩人也便安份了一會，但是他們後來僱了許多保鏢，到處防着，於是他們立刻又恢復他們的糜爛生活了。

我想起了我從北方的朋友寫給我的信裏，談起華北的中國軍隊，穿着布衣，凍得半死，他們沒有手套套着的手指都凍僵了，貼在槍柄上或手榴彈上掉下來，爲了什麼，我可真不懂？這輩頭髮光亮服裝畢挺的人們，一夜天所喝的和所跳的舞票所化的代價，不知可以救了多少人的手和生命？這種西人統治下的上海的中國「殖民地式」的產物，可以說在地球上是最腐化的一羣，除了香港之外，如果不

把這種腐化份子的勢力消滅的話，中國的抗戰的立場，會給他們動搖起來。

在這種糜爛生活場所相距不滿十幾里的地段上，躺着千萬具的屍兵，這給我們的印象實在太惡劣了——因為享受這種娛樂生活的人，並不是從前線歸來的壯士在返前方去拚死之前所享受的，而倒是那輩所謂『公子哥兒們』所享受。有一個星期日，我和愛黎先生到滬西去，因那邊是近戰場的地帶，相反他使我感到空氣新鮮和可愛。在那兒我們可以脫離這種喪心病狂的市區，在這市區裏可以說上海不是屬於中國的，而是屬於這輩特殊人物的世界，你會感到這是個千瘡百孔的地帶，同時也是個豐腴的天堂。

在公共租界之西，蘇州河西段之南，這區的地帶，佈滿了創傷，在那裏，日軍會集中了砲火的力量，曾有一星期之久，在一片荒涼的景色中，村屋是一點點的污點，被砲火轟斷了的橋樑，燒焦了的橋柱，孤獨地直立着，在地上，和身首不全的屍兵濇雜地躺着的，有穿藍布衣的農夫，日本人在這酷劫之後的村落，繼續不斷地還在搜括，他們追令俘虜的中國人，把那裏最後的一片鐵，或一塊銅都搜去；像鐵鍋、窗檻、門鎖、鐵犁、車軸、絞鍊、鐵釘、果絲釘——什麼都要。在田地裏佈滿了沒有爆炸的手榴彈、槍彈、和砲彈，最後都被他們搜括起來，還有許多佈滿彈痕的鋼盔，一半露在外面，一半連屍兵的頭顱被雨水窩在泥濘里埋着。日軍握了槍，命令一羣中國人，把這些屍兵掘起來搜括。

我看見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屍兵，身上發現二張血痕斑斑的鈔票，上面印着二個孫中山先生的像。『朋友，可不要渺視了在他斷了一半的手旁的他，那幷正在微笑的愛人照片，把它拾起來，他不会干涉也不會嗚咽，你可以拿他的錢，拿他的愛，這可對於這屍首的禱告，毫無妨礙。他祇希望你把他自己潰爛得發黑的肉體洗清，他起先以為女人是對體貼溫柔的，現在他唯一的企求，是急於洗清他生命上的污點，他是為了殉國而生的。不，不，不要忸怩把一元錢放回去，這是他保全了你的母親，或是你的女人的勇敢的獎賞，將他的衣服在雨水裏剝去。他會感謝你，快把他值得贊美的腐屍埋

到美麗的無名樂土裏去安眠」。

在那裏，到處可以看見草率的泥坎上，露出了緊握了拳的手隻或手臂，或是一條腿，或則一個粉粹了的頭顱骨，研究解剖學的學生們，可以來參觀這個景色，這種被炸彈在無意有意中解剖出來的現成標本。在一條大的汽車路上，那兒是鄉人把青菜運到市區銷售的道路，現在走過那裏，可以看見一條橋堍上的堡壘裏躺著屍首，手榴彈一顆顆豎起於那農夫所必經的小路上，那兒在泥漿裏發現在軍服上的一個證章：上面寫着張羽明三字。他的屍體，卻在一個草棚裏已經腐爛得生虫了。

鄉下人挑了一袋袋的米，繞道經過了這種千瘡百孔的戰場到上海去販賣。有時日軍勒令他們立停着「買路錢」，這樣都榨取了幾個銅元或角票，或則把鄉下老太婆手上的銀鐲拿了下來。到了公共租界口時，他們或她們又要付一元錢的「出口稅」。才可以越過鐵絲網進租界，雖則他們大多要化三四天工夫，冒了一路上的絕大的險阻，帶一些價值幾元錢的米穀出來販賣，當我們詢問他們由多少遠販來時，他們大多說是五里至六里。他們之中很少青年男女，大多是老年人和孩子們，我們看一個老人帶了一個女孩子和二個男孩子，正向西去，他說他們是歸田去，他們不是歸家，因為家是被砲火毀了。

「還是有地，還是有泥」，他接着又說，表示他的田地還在那裏。

住在這戰場裏的鄉下人們，在臨時搭成的席棚下，冷得發抖，似乎在恐懼着這個席棚也會遭劫。有幾個農夫在磚瓦礫邊耕植，同時很小心地怕鋤着死屍。我看見一個家庭，在他們房屋塌下來的瓦礫堆上面，圍坐着烘火取暖，他們張目對着那微弱的火燄。愛黎便拿出一些錢，給就近的一個女孩子，她有些羞怯他受了下來。他問她能不能露出笑容來。她搖搖頭，「現在是非常痛苦，但是最後他們會勝利的，這些敵人會趕回他們自己的老家去，我們便有好日子過了」。她帶着一種意外嚴正的神色說。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亞 洲 之 戰

初 版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每 冊 貳 百 元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著 者 史 諾

譯 者 國 振

出 版 山 城 書 店

發 行 山 城 書 店

分 售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200.00